

從漢代玉璧 論璧在中國文化史上的意義

鄧淑蘋
國立故宮博物院
器物處

提 要

在中國古代玉璧萌芽自距今六、七千年前的新石器時代晚期早段，經過四千多年的發展，到了漢代（西元前206年至西元220年），隨著國力擴張、文化提升，玉器文化高度發展，玉璧是最重要的器類之一。關於漢代玉璧的研究雖已不少，但仍留下若干待解的議題。筆者按紋飾將漢代玉璧分為四類九種，又依據考古現象及文獻記載將玉璧的功能分為三類十一種，試圖分析玉璧紋飾及功能的對應關係，更對玉璧的多樣性功能逐步發展的經過略作簡述。

從良渚文化晚期（公元前2600-2300年）玉璧上所刻的通神密碼的佈局，以及《周髀》中的「七衡圖」可知，玉璧的創形理念是人們對宇宙認知中太陽在天空行移的軌跡，也就是「黃道」，或稱為「光道」；隨著文化發展，先民對天象的認識漸趨豐富，人們觀察北天極的二十八個星宿可分為四個象，與農業社會觀象授時的季節、方位有關；更將這種時空運行變化規律用圖像符號等象徵手段表現，發展出四靈圖像，漢代時四靈圖像十分流行，多裝飾在象徵天體的空間中或器物上，四靈紋璧即是此一潮流中最具代表的文物之一。

經過中世紀時本土文化的沈寂，宋代新儒學（理學）運動興起後，文人重新審視最遠古、最本土的思想與信仰，雕有龍、虎紋飾的玉璧再度受到重視。玉璧，在歷史的洪流中永遠不被淘汰，這個神秘的器物，在中國文化中，具有永恆的崇高地位。

關鍵詞：玉璧、黃道、四靈

一、漢代玉璧的分類

玉璧萌芽自新石器時代晚期的早段，較原始樸拙的小玉璧已出現於東北地區的新開流文化（約西元前四、五千年）、左家山文化（約西元前四千多年），在新石器時代末期長江下游的良渚文化（西元前 3300-2300 年）中，以及新石器時代末期晚段（或稱銅石並用期），黃河中上游的齊家文化（西元前 2200-1700 年）中，¹ 玉璧文化得以高度發展。² 換言之，玉璧在中國有著源遠流長的歷史。

到了漢代（西元前 206 年至西元 220 年），玉器已經有四千多年的發展，隨著漢帝國勢力擴張，文化提升，玉器文化也高度發展。據統計，目前考古發現的漢代墓葬有三萬餘座，但出土玉器的墓葬不到千座，且大多集中在已發現的百餘座諸侯王及列侯級墓葬中。³ 在各類玉器中，璧是數量最多、意義最重要的一類。墓葬之外還有祭祀坑，璧也是祭坑中最常見的祭器。

過去已有多篇以漢代玉器為核心的論文，盧兆蔭先生〈略論漢代的玉璧〉一文較早且較全面，該文除了將考古所知漢代玉璧作詳細的分類與描述外，還根據文獻及考古資料，確認漢代玉璧的功能有：祭祀、朝賀、納聘、餽贈、貢獻、傳世寶、裝飾、喪葬等。⁴

大致而言，西漢大體承襲先秦及秦代的用玉制度，而在器類上加以簡化，禮制用玉主要是璧、圭兩類。根據《史記》可知，漢代天子用玉圭祭祀「上帝宗廟」；用玉璧祭祀天神「泰一」；用圭幣（玉圭配以束帛）祭祀重要的山川；黃河決口時，要投以玉璧祭祀水神。⁵ 漢宣帝時，在宮中供奉「玉寶璧」。⁶ 漢武帝曾以「束帛加璧」為瑞玉，招聘申公。⁷ 東漢承襲西漢的制度，仍以圭、璧為主要的禮儀用玉。皇帝執圭璧禮天地，以玉璧納聘皇后。⁸ 漢代每年正月朔旦朝賀，諸侯王、列

1 本文對新石器時代的分期及各文化年代，主要參考：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中國考古學·新石器時代卷》，及 2011 年 11 月該所官網公布之「中華文明探源工程〈二〉——考古學文化譜系年代研究」。但齊家文化年代參考該所甘青隊隊長葉茂林研究員的論文及意見。

2 鄧淑蘋：〈史前至夏時期璧、琮時空分佈的檢視與再思〉，楊晶、蔣衛東執行主編，《玉魂國魄——中國古代玉器與傳統文化學術討論會文集（四）》。

3 徐琳，〈漢代玉器的藝術風格〉，頁 22-26。

4 盧兆蔭，〈略論漢代的玉璧〉，收入《中國考古學論叢——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建所四十週年紀念》。亦收於氏著，《玉振金聲——玉器·金銀器考古學研究》。

5 分別見於《史記》的「孝文本紀」「孝武本紀」「封禪書」「河渠書」。

6 見《漢書·郊祀志下》。

7 見《漢書·儒林傳》。

8 見《後漢書·明帝紀》，《後漢書·皇后紀（下）》。

侯都要執玉璧，這些玉璧是少府發放的。⁹ 這些文獻均已有了翔實的論述。¹⁰ 為節省篇幅，本文不多作轉引。

值得注意的是，文獻記載雖多，但有關這些玉璧的紋飾與尺寸的記載卻非常稀少，僅《史記·孝武本紀》記載，皇帝祭祀泰一時：「有司奉瑄玉」；根據《爾雅》、《說文》可知，「瑄」就是六寸大的玉璧。漢代的一寸，約為今日 2.3 公分，¹¹ 那麼「瑄玉」就是直徑近 14 公分的玉璧。這在漢代是很常見的玉璧尺寸，但是文獻並未告訴我們「瑄玉」上雕琢什麼樣的花紋。

清人王先謙為《後漢書·皇后紀（下）》作集解時，引了《漢雜事》的記載「以黃金二萬斤，馬十二匹，元（玄）纁穀璧，以章典禮。」據此，學者認為漢代皇帝納聘皇后時，要用穀紋璧。¹²

綜上所述，漢代有關玉璧的文獻不少，但多僅記錄各種用途，對於玉璧的紋飾、尺寸與功能的對應關係，卻鮮少敘及。本文將考古出土及傳世可靠的漢代玉璧分為四大類：

- （一）素璧，包括全素，以及僅在孔邊及外緣各雕一圈弦紋的共兩種。
- （二）幾何紋璧，包括：穀紋璧、蒲紋璧、乳丁紋璧三種。
- （三）複合紋璧，¹³ 包括：雙身合首夔龍紋璧¹⁴ 及鳳紋璧。
- （四）鏤雕及出廓神靈動物紋璧，其中有的已發展成四靈紋璧。

除了幾何紋璧中的乳丁紋璧出現較遲，約始見於西漢晚期，流行於東漢，此外，各種玉璧都是戰國時期已出現的，素璧更可溯源自新石器時代。下文擬分節從考古出土資料，探討各類玉璧的功能及意義。

9 見《續漢書》的「禮儀志（中）」「百官志（五）」，以及《後漢書·朱暉傳》。

10 盧兆蔭，〈略論漢代禮儀用玉的繼承與發展〉，《文物》，1998年3月。亦收入《玉振金聲》一書。

11 丘光明，《中國古代度量衡》，頁78。

12 同註10。

13 此種玉璧有各種稱法，此處選擇孫機先生的定名，見其，《漢代物質文化資料圖說》，頁365。

14 學界有關此種璧的命名頗為複雜，筆者以前論文中多稱之為「雙身動物面紋璧」，近來曾考量紋飾的意義應是大傳統中的龍與鳳，因而稱之為「龍鳳紋璧」，見筆者主編及主要執筆《敬天格物——中國歷代玉器導讀》。目前考量只稱之為龍鳳紋璧很難傳遞其「雙身合首」的特點，故接受盧兆蔭先生在其〈略論漢代的玉璧〉一文中的定名，稱作「雙身合首夔龍紋璧」，該文資料見註4。

學界對於西漢、東漢的分期說法紛紜，本文的分期如下表。¹⁵

西漢	早期	高帝至景帝	西元前206-前141年
	中期	武帝至昭帝	西元前140-前74年
	晚期	宣帝至平帝	西元前73年至西元8年
新			西元8至25年
東漢	早期	光武帝至章帝	西元25至88年
	中期	和帝至順帝	西元89至144年
	晚期	沖帝至獻帝	西元145至220年

二、漢代的素璧

漢代皇陵附近的祭祀遺址中常出土尺寸較小，直徑在 10 公分之內，甚至不到 5 公分的素璧，質地或為泛青灰色的閃玉（Nephrite）、或為白色方解石（Calcite，俗稱「大理石」「漢白玉」）。如圖 1 出土於漢景帝陽陵建築遺址，圖 2 出土於陽陵東側 18 號從葬坑；¹⁶ 西漢武帝的寵幸李夫人墓旁曾出土石圭 140 件、石璧 90 件，璧徑約 5-6 公分。¹⁷ 西漢昭帝平陵園內出土兩組玉圭、玉璧，都是以多件圭圍繞一件璧的方式鋪排，圖 3 為其中一組。¹⁸ 西漢宣帝杜陵曾出土石圭、石璧。¹⁹ 漢武帝茂陵的禮制建築白鶴館，也曾出土數量較多的玉圭、玉璧，²⁰ 這些多是當初禮儀祭祀活動後埋入的。

漢代的素璧也有超過 10 公分的，可出於祭祀遺址，也可出於墓葬。甘肅禮縣西北海拔約 1,700 米的鸞亭山山頂，可能是漢代祭祀昊天上帝及日月星辰的「西峙」遺址，出土十一套組合完整的玉器，共 51 件，器類有三種：圭、璧、人像，所用的璧有二類，白色方解石製作的素璧（圖 4），以及青綠色閃玉雕琢的複合紋璧。直徑多為 13-14 公分，也有徑達 22 公分者（詳後）。²¹ 據考證主要是西漢時期

15 西漢分期依照：劉雲輝，《陝西出土漢代玉器》。東漢分期依照：信立祥，〈漢畫像石的分期與分區研究〉，《考古類型學的理論與實踐》。

16 漢陽陵博物苑、王保平主編，《漢陽陵博物苑》，頁 55，62，63。

17 劉雲輝，《陝西出土漢代玉器》，頁 11-12。

18 咸陽博物館，〈漢平陵調查簡報〉，頁 45-49。圖見於劉雲輝，同上註。

19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漢杜陵園遺址》，頁 73。

20 劉慶柱、李毓芳，《西漢十一陵》，頁 50。

21 早期秦文化聯合考古隊，〈2004 年甘肅禮縣鸞亭山遺址發掘主要收穫〉，頁 4-14、89-97。

遺留。²²

陝西華陰縣華山腳下曾出土若干件玉圭和七件玉石璧，其中三件素璧直徑均超過 10 公分，（圖 5、6）還有四件穀紋璧（原報導稱為「渦紋璧」「蒲格渦紋璧」）。據考證為西漢武帝時建集靈宮祭祀華山的祭玉。²³

墓葬中出土素璧不多，可分為三種情況：

- （一）貼飾在漆棺外壁。如河北滿城中山靖王妃竇綰漆棺上就鑲了 26 塊素璧，外徑或 13.8-14.2 公分，或 25.8 公分。²⁴
- （二）放在墓主頭端，目前僅一例，即大連普蘭店市西漢晚期墓出土玉璧與玉覆面。報導稱玉璧「位於頭骨北側，直接落於棺底之上」；璧上有一層「皮革類（？）的腐朽物」，其它被認為是玉覆面的零件玉片與小玉圭，分散在附近。經復原，則如圖 7 所示，圓璧在玉覆面的上方。²⁵ 筆者曾親赴瀋陽檢視實物。²⁶
- （三）可能為皇帝賞賜臣屬的贈禮，如出土於河北滿城中山王墓棺槨之間的素璧（圖 8），及出土於東漢末年曹操高陵的玉石璧（圖 9）。²⁷

《禮記·雜記上》中記載，貴族去世後，他的國君即派遣使者手執著璧送來給亡者口含之物；另派使者手執著圭，送來喪禮的禮物，這些璧與圭也為喪家所有。²⁸ 雖然《禮記》所記多為戰國時代的禮俗，但從戰國到漢代，許多禮俗一脈相

22 梁云，〈對鷺亭山祭祀遺址的初步認識〉，頁 15-31。梁云還認為西安北郊聯志村、西安西北郊蘆家口村的祭祀坑，過去曾被訂為戰國時期秦國祭祀坑，也可能是西漢的。是否如此？有待深入探討。

23 劉雲輝 2009，同註 17，頁 12、圖 31-33，59-61。

24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等，《滿城漢墓發掘報告》，頁 242。

25 白寶玉等，〈遼寧普蘭店姜屯漢墓（M45）出土玉覆面復原研究〉，頁 69-73。

26 承蒙遼寧省文物考古所李向東所長及發掘人白寶玉主任同意，筆者於 2012 年 12 月 13 號前往該所檢視此組玉器，特此中謝。經仔細觀察，確認這二十多片的質地幾乎都是閃玉，部份是前代遺物（龍山時期玉璜形片、西周龍紋柄形器、戰國至西漢早中期穀紋璧、雙身含首夔龍紋璧等）改製，但仍有部份可能是當時用玉料製作的，如圭、璧等呈淺青綠玉，內含甚多細微黑點；蓋于眼睛的兩塊近梯形者，呈半透明白色夾大片灰黑小點；雖不能一定確認它們為崑崙山蘊藏的閃玉（俗稱和闐玉），但確定不會如報告中所稱來自遼寧岫岩（因為岫岩閃玉多呈黃綠玉，少數白玉，幾乎無青綠色，也極少含大片小黑點）。玉圭製作規整，拋光佳。但玉璧做工較差，中孔及外緣都有歪斜的現象，孔壁、器外壁所留旋痕也寬窄不一。

27 潘偉斌等，〈曹操高陵〉，《2009 中國重要考古發現》。

28 《禮記·雜記上》：「舍者執璧將命曰：『寡君使某舍。』相者入告，出曰：『孤某須矣。』舍者入，升堂，致命。再拜稽顙。舍者坐委於殯東南，有葦席；既葬，蒲席。降，出，反位。宰朝服，即喪屨升自西階，西面，坐取璧，降自西階以東。上介贈：執圭將命，曰：『寡君使某贈。』相者入告，反命曰：『孤某須矣。』陳乘黃大路於中庭，北轡。執圭將命。客使自下，由路西。子拜稽顙，坐委於殯東南隅。宰舉以東。凡將命，鄉殯將命，子拜稽顙。西面而坐，委之。宰舉璧與圭，宰夫舉襚，升自西階，西面，坐取之，降自西階。贈者出，反位於門外。」

承。《史記·世家·卷六十》記錄了漢武帝的寵幸王夫人過世後，皇帝遣使者「奉璧一」，追封她「齊王太后」的諡號。²⁹《後漢書·志·志第六》仍記載諸侯王、列侯等過世後，「天子使者贈璧帛」。³⁰以上史料證明西、東漢時，仍遵守天子派使者致贈玉璧給皇室成員及諸侯王、列侯等作為贈禮的傳統。很難得的是在近日考古資料中，也找到了實證。長沙漁陽西漢墓出土的木榻上，清楚地寫了「陛下所以贈物青璧三」。³¹

前文曾述及《漢雜事》有「穀璧」一詞；長沙漁陽西漢墓木榻所書「青璧」一詞僅形容色澤並未形容紋飾。東漢末年丞相曹操自封「魏王」，他提倡薄葬，墓葬中應該沒有裝飾用或喪葬用的玉璧，所出土三件尺寸相同的，在內、外邊緣處，各刻一道弦紋的素璧（圖 9）很可能即是必須隨墓主入葬之皇帝賞賜的贈禮。³²

中山靖王墓出土物繁多，且層疊關係複雜，經筆者核對報告中的紀錄，並請教發掘主持人盧兆蔭先生，才對棺槨之間平面圖有了清楚的瞭解。該墓棺槨之間共出有五件璧，在圖 10 平面圖中自上而下編號為：48，98，107，225，94。素璧是編號 107 者。在其旁及放置三件玉圭，³³ 平面圖列出 96，95 二件，另一件編號 226 玉圭被壓在編號 96 玉圭之下。³⁴ 玉圭是代表墓主人身份的禮器，或因此故，放在最靠近素璧的位置。

除了 107 號素璧外，還有 48 號透雕雙龍穀紋璧（圖 11）、225 號鳳紋璧（圖 12）被壓在 107 號素璧下面、³⁵ 94 號雙身合首夔龍紋璧（圖 13）、98 號是一件穀紋璧或蒲紋璧，報告中沒有出版線圖。從紋飾觀之，在此棺槨之間的五件璧，幾乎涵括了大部分的漢代玉璧的類別。因為自古以來，在玉禮器的範疇中即有「大圭不

29 《史記·世家·卷六十·三王世家第三十》：「王夫人者，趙人也，與衛夫人並幸武帝，而生子閔。……王夫人死而帝痛之，使使者拜之曰：「皇帝謹使使太中大夫明奉璧一，賜夫人為齊王太后。」

30 《後漢書·志·志第六·禮儀下·大喪·諸侯王列侯始封貴人公主薨》：「諸侯王，傳、相、中尉、內史典喪事，大鴻臚奏謚，天子使者贈璧帛，載日命謚如禮。」

31 宋少華，〈長沙西漢漁陽墓相關問題雜議〉，頁 59-63。該墓出土木榻 1，載明「陛下所以贈物：青璧三、紺繒十一匹、薰繒九匹」。

32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河南安陽市西高穴曹操高陵》，頁 35-45。

33 該墓棺槨之間共有三件玉圭，分別高 20.8、18.6、9.4 公分，但平面圖只顯示編號為 96，95 的兩件，據盧兆蔭先生告知，編號 226 玉圭被壓在 96 號之下。

34 三件玉圭，分別高 20.8、18.6、9.4 公分，其疊壓關係係承蒙盧兆蔭先生指導，特此申謝。

35 承蒙盧兆蔭先生指導，特此申謝。

琢」以素為貴」的傳統；³⁶再綜合漁陽出土書有「青璧」的木榻，以及曹操青陵出土素璧的實例，可合理推測漢代皇帝贈禮所用之璧應為光素或僅刻簡單弦紋。

三、漢代的幾何紋璧

幾何紋璧包括穀紋璧、蒲紋璧、乳丁紋璧三種。

穀紋璧數量最多。穀紋，是從西周玉璧上的龍紋，經春秋時分解為雲紋，戰國時再進一步簡化為似日文字母「の」的花紋。製作較精緻時，中央部位浮雕成圓形凸起，連著一條細細的尾部；但也常見製作較簡略，中央沒有浮雕出圓凸，僅以細陰線刻繪出「の」紋，這種平面穀紋有時被稱為「渦紋」。

戰國晚期至西漢是穀紋流行的時期，精緻的穀紋璧常沿著圓周與圓孔的邊緣，各有一圈窄細的光素圓圈帶，且常呈靠外的一側高、貼著璧面的一側低的斜坡形。西漢晚期時，穀紋的尾部省略，發展成排列整齊的圓凸，即為乳丁紋，沿著圓周與圓孔邊緣的光素圓圈帶也變得較為寬而平坦；乳丁紋璧流行於東漢，原則上時代越晚，乳丁越疏朗，圓圈帶越寬平。

蒲紋，出現於戰國晚期，流行於西漢。它是以三組不同方向的平行線，將器表劃分成等分的六角形格子的幾何紋。有人認為蒲紋是尚待繼續加工為穀紋的前身，也有人認為它是穀紋的簡化，但在戰國晚期至西漢墓葬中，穀、蒲兩種紋飾的玉璧經常並存，而蒲紋璧也都經過細緻的拋光工序，所以筆者認為戰國至漢代先民的心目中，穀紋與蒲紋應該是兩種不同的紋飾。有的學者稱在蒲紋璧的六方格子中加刻了「の」形線紋者為「蒲格渦紋璧」，³⁷本文將有「の」形紋飾者，不論立體或扁平，一律稱為「穀紋璧」。

穀紋璧的功能較廣，尺寸中小型者，可單獨懸佩或與其它玉件串連為組玉佩。例如南越王墓中的左夫人（C組）、□夫人（E組）、F組等、殉人（RX II）所佩之組佩中都有穀紋璧。³⁸前文所介紹的圖 11，本體也是一件穀紋璧，只是上方鏤雕了華麗的雙龍出廓的紋飾。穀紋璧也可用於祭祀日神，山東烟台芝罘島曾在一個長

36 《禮記·禮器》：「禮有以文為貴者……有以素為貴者，至敬無文，父黨無容，大圭不琢，大羹不和……此以素為貴也。」

37 劉雲輝，《陝西出土漢代玉器》，頁 11-12。

38 廣州西漢南越王墓、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求知雅集、兩木出版社，《南越王墓玉器》，圖 143，149，150，165。

方形土坑中出土兩組祭祀用玉，每組為一件穀紋璧、一件素玉圭、兩件素玉觶；初步推測為秦始皇舉行祭祀陽主所埋。³⁹ 山東最東北端榮成市成山頭也曾出土兩組玉器，可能是祭日神後所埋，A 組為一璧、二圭、一璜，可能為漢武帝東巡祭日所埋；B 組為一璧、二圭，可能為秦始皇東巡祭日所埋。⁴⁰ B 組的玉璧就是穀紋璧。（圖 14）

除了佩帶、祭日兩種功能外，穀紋璧也可用作喪葬用玉。如圖 15 穀紋璧，就與圖 16 蒲紋璧、圖 17 雙身合首夔龍紋璧同時用作中山靖王劉勝玉衣內貼身的璧，只是穀紋、蒲紋的兩件尺寸較小，貼放於前胸；而雙身合首夔龍紋璧較大，放置於背部。類似的情形也見於中山靖王妃竇綰墓、南越王墓等。在南越王墓中，墓主被套在絲縷玉匣內，玉匣又稱「玉衣」，綴聯玉片將亡者全身包裹密實，唯有頭頂部位綴聯以玉璧，璧之中孔正好蓋於墓主頭頂俗稱「天門蓋」的部位，就是特意讓人的靈魂通過玉璧中孔進入不朽的天界。

值得注意的是，在竇綰墓的中室有許多磚瓦，在東南角出現兩件穀紋璧（圖 18 之 12，13），⁴¹ 原報告並未對此現象作任何推測。《史記·封禪書》記載，建章宮前殿之南有「璧門」，《三輔黃圖》紀錄：「椽首薄以玉璧，因曰璧門。」此即說明可能漢武帝時已有在門上架住屋瓦的圓木（椽）一端貼飾玉璧的習俗，竇綰墓的中室已建造成有磚瓦的房室，是否在椽木上貼著玉璧呢？這是值得研究的現象。⁴²

目前的資料顯示，西漢時蒲紋璧也常用於組佩中；如南越王墓出土的口夫人 F 組、殉人（RX III）所佩。⁴³ 蒲紋璧也經常被放置在亡者肉體上，外面再罩以用玉片綴聯的「玉匣」（如圖 16），顯然是希望亡者多多吸納美玉的精氣，協助亡者魂歸天、魄歸地。

西漢晚期至東漢是乳丁紋璧的流行期。較常見的是用銅泡將一枚乳丁紋璧釘附在內棺前端檔板上，如圖 19 就是西漢宣帝五鳳四年（公元前 54 年）廣陵王劉胥妻

39 烟台市博物館，〈烟台市芝罘島發現的一批文物〉，頁 93-94。

40 王永波，〈成山玉器與日主祭——兼論太陽神崇拜的有關問題〉，頁 62-68。筆者詳讀該文，認為作者對 A、B 兩組玉器時代相對早晚的推測未必合理，這類穀紋璧、雙身動物面紋璧在戰國晚期至西漢早中期都見出土。

41 報告中稱為渦紋璧，即是穀粒中央不立體。

42 此墓的發掘主持人盧兆蔭先生認為筆者的推測有一定的文獻依據。

43 廣州西漢南越王墓、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求知雅集、兩木出版社，〈南越王墓玉器〉，圖 150，169。

子的墓葬（高郵神居山第二號漢墓），棺上所釘的乳丁紋璧。⁴⁴此例似為目前所見年代最早的乳丁紋璧，每個乳丁還保留六面琢磨的痕跡。東漢時乳丁紋璧較多，乳丁多琢磨得較圓潤，排列較疏朗，如圖 20。⁴⁵

四、漢代的複合紋璧

（一）複合紋璧，包括：雙身合首夔龍紋璧及鳳紋璧

雙身合首夔龍紋璧是戰國中期突然出現的，而且一開始就是以數量豐沛、工藝成熟的局面登上歷史的舞台。在造形上，它猶如在穀紋璧的輪廓外，增加一週雕有三至五個結構相同的「雙身合首夔龍紋」的圓圈帶，因此整個璧的直徑增加不少，甚至可達 33 公分左右。

且這類玉璧多以一種夾帶細小黑色粒狀雜質的青綠至碧綠色閃玉製作。伴隨著雙身合首夔龍紋璧的出現，戰國中晚期也出現大量的用這種青綠至碧綠閃玉製作的穀紋璧、「S」狀龍形佩等。這樣的玉料極少出現於戰國早期及其以前的玉作中，筆者推測，戰國中期時肯定發現了比較厚實的青綠至碧綠閃玉的礦脈，甚至當時可能直接開採山料，而非靠撿拾河中籽料，才能有豐沛的大型玉料，讓戰國中期的華東先民掀起中國玉雕史上這麼一場不小的變革。已有學者分析獅子山楚王陵出土的玉片，認為這類碧玉來自新疆和闐，⁴⁶但對比其它相關研究，似乎暫時還難有定論。⁴⁷

目前考古出土年代最早的雙身合首夔龍紋璧見於山東曲阜魯故城的戰國中期（約公元前 400-300 年）墓葬中。共出土了九件雕琢精美的雙身合首夔龍紋璧。五件琢為內外二層同心的圓圈帶，內層雕穀紋，外層雕四個單元的雙身合首夔龍紋，龍首面孔向外，直徑從 19.9 至 27.7 公分。另四件琢為三層同心的圓圈帶，中層雕穀紋，外層雕五個單元，龍首向外的雙身合首夔龍紋；內圈雕三個單元，龍首也向

44 徐湖平主編，殷志強編著，《古玉菁華——南京博物院玉器館展品選萃》，圖 39。

45 西漢分期依照：劉雲輝，《陝西出土漢代玉器》，圖 58。

46 谷嫻子等，〈徐州獅子山楚王陵出土金縷玉衣和鑲玉漆棺的玉料組分特征及產地來源研究〉，頁 54-63。

47 根據谷嫻子等的研究，認為楚王陵玉片屬於熱液交代型鎂質大理岩型閃石玉，來自新疆和闐。但目前地質學家找不到和闐碧玉的原生礦床，王時麒等利用和闐一帶的碧玉籽料分析，認為和闐碧玉是從超基性岩變質而成。見：王時麒、員雪梅，〈和闐碧玉的物質組成特徵及其地質成因〉，頁 4-7。

外的雙身合首夔龍紋，直徑約 31-32.8 公分。⁴⁸

該遺址編號 M58:3 的雙身合首夔龍紋璧紋飾最繁複，報告中形容為：「四組雙尾龍與四對鳥首蛇身獸相互纏繞」，⁴⁹（圖 21a, b）「獸」是指胎生有毛的動物，鳥與蛇都不能稱為「獸」；報告中的用語雖不夠正確，但此璧確實說明了此類紋飾的真正意涵：兩種神靈動物以彎繞的蛇狀身軀相互纏繞，其中一種明顯地有著鳥頭，在二元思維盛行的上古時期，這樣的組合最可能就是龍與鳳，龍首是可以千變萬化的，但必須具有長條的蛇體。

山東臨淄商王村戰國晚期齊國墓葬出土一件雙身合首夔龍紋璧，龍首長著長尖的牛角，八字鬚鬚，龍首左右兩個彎條形身軀上各勾掛著一隻簡化的鳳鳥，鳳首的鳥喙、鳥眼還清晰可見，但鳥身卻有如蝌蚪般；商王村還出土了圖 22 玉璧，龍首造型比較敦厚，長著向上彎捲的雙角，左右龍體上鉤掛的鳥兒已不見鳥喙、鳥眼，整體就像一隻蝌蚪。（圖 22、23）⁵⁰

安徽長豐楊公鄉戰國晚期楚國墓葬出土的雙身合首夔龍紋璧，龍首面孔就向著璧孔，與魯故城、商王村出土璧上的紋飾方向正相反。由此可知，戰國中晚期是這類玉璧的創發期，紋飾結構尚未定制。但到了漢代，此類玉璧的合首夔龍的頭像多向外，前文圖 17 中山靖王劉勝墓出土者即是。

有學者認為這樣的動物頭像是虎首，造形源自伊朗波斯波利斯石雕上的獅首。（圖 24）經過西伯利亞阿爾泰巴澤雷克地區，獅首的耳朵逐漸演變成向後延伸的卷紋。（圖 25）到了東亞地區就發展成戰國中期以後這種玉璧上的虎首。⁵¹

筆者贊同此一敏銳的觀察，戰國中期以來，自中亞、西亞傳入的文化因素，的確刺激中土的藝術表現，不少此類玉璧上的動物頭像（如圖 17、23）也的確相似於圖 24、25 這些西亞、中亞的獅首或虎首的五官，但也有的就不算相似了，如圖 22 商王村出土及圖 26 徐州獅子山出土者。

事實上，中國早有悠久的「一首二身」以及「龍鳳相伴」的藝術母題，如圖 27

48 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曲阜魯國故城》。

49 同上註，頁 161，圖 113，圖版玖柒。

50 淄博市博物館等，《臨淄商王墓地》，圖 41、40。

51 Jessica Rawson, "The Eternal Palaces of the Western Han: A New View of the Universe," *Artibus Asiae*, vol. LIX, 1/2, 1999, pp. 5-58. (中譯) 杰西卡·羅森, 〈西漢的永恆宮殿——新宇宙觀的發展〉, 《祖先與永恆》, 頁 285。

商晚期銅器上的夔龍、夔鳳紋，戰國中期以後流行的雙身合首夔龍紋璧，雖或呈現相似於來自西亞與中亞的獅、虎面，但也常有其它長牛角（圖 22）、帶長鬚的動物面像（圖 26），而其一頭二身的圖像結構，以及龍鳳依存的藝術母題應有其本土的因素。

西漢時，雙身合首夔龍紋璧仍非常盛行，但又出現第二種複合紋璧，就是以鳳紋取代雙身合首夔龍紋的鳳紋璧，如圖 28，內圈琢蒲紋，外圈圍繞四隻相同造形的鳳鳥。雙身合首夔龍紋璧與鳳紋璧這兩種複合紋璧在漢代一直流行，只是東漢墓葬出土者常雕工較粗糙。

從出土資料可知，這兩種複合紋璧在漢代大量製作，除了不能當作佩飾器之外，在禮器、喪葬器的範疇中非常普遍。大致而言，雙身合首夔龍紋璧似乎比鳳紋璧使用量更豐。

在墓葬中，複合紋璧常被放置在玉匣內，貼在墓主人的前胸後背上；中山靖王劉勝、王妃竇綰，南越王墓等這些沒有被盜掘的墓中，都很常見。（圖 28）徐州獅子山漢墓曾經盜掘，但這類玉璧仍很多見，可貼飾在漆棺上，甚至用雕有這類璧的形狀紋飾的方形玉片直接貼在漆棺外。⁵² 雙身合首夔龍紋璧也可用鑲金銅釘固定在棺木頭端，如高郵天山漢墓。⁵³ 墓葬中大量使用這類玉璧，是因為當時人們深深相信這樣的玉璧有助於亡者魂歸天、魄歸地。

除了用於喪葬場合外，兩種複合紋璧都可作為祭祀自然神祇的禮器。甘肅禮縣鸞亭山祭祀坑中也出土雙身合首夔龍紋璧與鳳紋璧，後者的上面還壓著一件玉圭。（圖 29）

最值得注意的是圖 30，出土於山東東北端榮成市成山頭 A 組祭日禮器中的玉璧，⁵⁴ 筆者於 2007 年夏天在青島市博物館見到實物，⁵⁵ 它的玉料不是前述那種大量出現於戰國中期至漢代的青綠至碧綠玉，而是呈淺灰青泛藍綠色的閃玉，內圈雕琢蒲紋，外圈原本雕琢三組雙身合首夔龍紋，但卻被沿著圓周削切一圈，故直徑

52 李春雷，〈江蘇徐州獅子山楚王陵出土鑲玉漆棺的推理復原研究〉，頁 55-71。李銀德，〈漢代玉棺與鑲玉漆棺〉，頁 875-883。

53 南京博物院編，《騰飛龍——2012 龍年龍展》。

54 原圖發表於：王永波在《文物》，1993 年 1 期的論文中，本文為配合與圖 30 對比，將之作了適度的迴轉。

55 承蒙山東大學樂豐實教授及青島市文物保護研究所林玉海所長的周詳安排，青島市博物館王莉副館長及該館工作人員的協助，能親自檢視 A 組玉器，特此申謝。

僅剩 14.3 公分，以致夔龍的眼睛、鼻頭都已不見。圖 31 是紋飾結構相似的雙身合首夔龍紋璧，夔龍的眼睛、鼻頭完好無缺，直徑達 19 公分。由此可推估圖 30 這件，沿邊可能曾切去二公分多寬的圓圈帶。為何要用一個被切去一圈的玉璧祭祀日神？是禮官的疏忽？還是特殊的儀式？值得繼續追蹤研究。

中山靖王劉勝墓的中室駕有帷幕，在中室的中部出土了一件蒲紋鳳紋的複合璧（該墓 1:4124），直徑 18.9、孔徑 4.3、厚 0.7 公分，報告中無器物圖，但文字形容該玉璧很相似於圖 28。⁵⁶ 報告中還敘及中室中區中部出土許多鍍金銅帳構，可知當初這裡有精巧華麗的帷帳。⁵⁷ 《漢書·東方朔傳》《漢書·西域傳贊》都記載漢武帝時興造華麗的「甲乙之帳」，飾以「隨珠、和璧」，顯然在劉勝的時代，已經流行在帷帳上懸掛玉璧，那麼圖 32 中編號 124 的玉璧是否曾這樣使用？也是值得推敲的。⁵⁸

五、漢代的鏤雕或出廓神靈動物紋璧

從戰國到漢代都流行將璧面鏤空雕琢具有動感的神靈動物紋，漢壁上最常見的神靈動物主題有：雙龍、雙虎、龍與虎，而鳳、熊、猴等動物紋，時或穿插在龍、虎紋中。「龍」本屬想像中的神靈動物，「虎」則為現實存在的動物，但是在戰國、漢代玉器上的龍、虎紋常具有相似的、前後肢齊全、扭轉有力的身軀，但龍首多作側面有角，虎首則多作正面梯形雙耳。

近代又常將古文獻中或指「山獸」或指「無角龍」的「螭」字，用來形容被神靈化的虎紋，稱為「螭虎紋」。⁵⁹ 本文為避免混淆，直接稱「龍紋」「虎紋」。

有的鏤空紋璧不加附飾，如圖 33，更多的是在輪廓外附加精美的鏤空動物紋。學者分析時代風格演變，認為如圖 34、35 這類在外緣附加二、三個小附飾的，屬於戰國晚期風格，即或出土於西漢早中期墓葬，一部份也可能是戰國時代遺留下來的。西漢中期發展出新的設計，就是如前文圖 11 所示，只在璧的上方凸起高而

56 《滿城漢墓發掘報告》頁 134、424。

57 《滿城漢墓發掘報告》頁 29。

58 此墓的發掘主持人盧兆蔭先生認為筆者的推測是合理的。

59 《左傳·宣公三年》《左傳·文公十八年》中出現「螭」，注疏者釋為「螭，山神，獸形。」「螭魅，山林異氣所生，為人害者。」漢代開始將「螭」與「龍」聯繫，《說文》：「螭，若龍而黃，北方謂之地螭，從蟲，離聲，或無角曰螭。」

大致對稱的鏤雕動物紋。到東漢時，璧上方的透雕附飾逐漸變得寬廣低平，如圖 36。⁶⁰ 從出土資料可知，尺寸不大、玉質與雕工均很精美的鏤空並出廓小璧，常是高級貴族組玉佩中的附件，如圖 34、35 就是南越王以及他的右夫人組玉佩中的組件。(圖 37、38)⁶¹

大約新莽時期開始在附飾或璧面中央雕琢吉祥語，目前考古出土實例中年代較早的一件是廣西合浦新莽時期墓葬出土玉璧。(圖 39)⁶² 從尖而高的附飾造形，以及虎頭趨於短寬，五官趨於平坦的造形來看，帶有西漢晚期的風格；圖 40 就是西漢晚期虎紋玉佩。⁶³ 但是圖 39 的璧面乳丁較為疏朗，又接近東漢風格，筆者精算圖 11、19、36、41 四個有時代定點的玉璧上每個穀粒或乳丁的平均佔幅；⁶⁴ 筆者認為將圖 39 合浦玉璧定在「新莽至東漢早期」較為恰當。

圖 36、39、41 共三件出廓神靈動物紋璧分別高達：25.5、27、30.5 公分，後二者中央上方還有供懸掛的圓弧或圓圈，應是可懸掛在帷帳或宮門的裝飾用璧，圖 36 中央上方無著勾處，可能用作被供奉的「玉寶璧」。

值得關注的是五件雕有四靈紋的漢代玉璧，其中二件(圖 45、46)屬清宮舊藏，兩件在二十世紀前半流散到英國(圖 42、44)，一件是二十世紀末的流散品(圖 43)。

五件中有三件在上方中央琢有圓弧形掛勾，可供穿繩懸掛於宮殿或帷幕(圖 44、45、46)；另二件無論是否上方有出廓鏤雕，都無法懸掛，很可能是供奉用的

60 盧兆蔭，〈剔透玲瓏玉寶璧——漢玉漫談〉，頁 16-18。亦收於氏著，《玉振金聲——玉器·金銀器考古學研究》。

61 廣州西漢南越王墓、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求知雅集、兩木出版社，《南越王墓玉器》，圖 52，133，1991 年 12 月。值得注意的現象是，只有南越王及右夫人的組佩中有這樣精美費工的鏤空附出廓雕飾的小璧，如前述同墓的左夫人、殉人等所佩的組玉佩中只見一般的穀紋璧、蒲紋璧。

62 「宜子孫日益昌」玉璧曾於 1998 年發表於：蔣廷瑜，〈廣西先秦兩漢玉器略說〉，收入鄧聰主編，《東亞玉器》。文中僅說「在合浦縣黃泥崗、母豬嶺、凸鬼嶺、北插江鹽堆等西漢晚期至東漢的墓葬…」古方主編，《中國出土玉器全集·11》第 189 頁發表這件玉璧的彩圖，訂為新莽時期。

63 大葆台 1 號墓墓主為廣陽頃王劉建，卒於元帝元初四年(西元前 45 年)，2 號墓為廣陽頃王王后墓，年代再稍晚。見：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大葆台漢墓》，頁 97。

64 筆者精算本文圖 11 西漢中期中山靖王墓(西元前 113 年)玉璧，圖 19 西漢晚期神居山 2 號墓(西元前 54 年)，圖 36 東漢早期中山簡王劉焉墓(西元 90 年)，圖 41 東漢晚期中山穆王劉暢墓(西元 174 年)玉璧器表每個穀粒或乳丁的平均佔幅(即是全長除以乳丁數)大約分別是：0.588、0.7、0.682、1.12 公分，時代越晚佔幅越大，意指排得越疏。而圖 39 廣西合浦出土這件每個乳丁的佔幅約在 0.805-0.85 公分間。

「玉寶璧」(圖 42、43)。⁶⁵

從出土資料可知，自西漢晚期、新莽時期以來，無論頭部作側面的龍，或頭部作梯形的虎，都常在身體上裝飾似豹身斑點的圓點紋，有龍紋特徵者更常以鱗片裝飾頸部。⁶⁶ 西漢時，神靈動物多精神抖擻、氣宇軒然，充滿神秘感，進入東漢中晚期後，逐漸蛻變出華麗堆砌的裝飾趣味，時代越晚，越多表情詼諧，四肢交代不清，紋飾細部不合理的動物造形，尤其是在東漢晚期，許多精美的作品上的龍紋都雕成有大鼻瘤的長眉獨角龍。筆者曾有專文分析這種變化。⁶⁷

在仔細排比斷代後，我們發現漢代的四靈紋璧的四種動物中，玄武的造形變化最多樣，五件中有二件玄武是具象的烏龜：其中一件只琢一隻龜(圖 44)，另兩件琢成龜與蛇(圖 43、44)，而圖 43 的蛇首造形很詭譎(圖 43-B4)。二件東漢晚期的玄武琢成弓背蛇身的烏喙長眉獨角小龍(圖 45-D4、圖 46-E4)，「弓背」的造形或就是象徵烏龜；唯有圖 42 玉璧上的玄武可能是一條蛇，身軀似兩條並列的水管，全身布滿鱗片，頭部猙獰，張口咬住(可能藏在雲中)某個動物的尾巴。⁶⁸

以下先逐件介紹這五件玉璧。

圖 42 是一件二十世紀初年流散到英國的四靈紋璧，應是北京尊古齋黃濬賣出(圖 42a)，載於他 1939 年的出版品中。⁶⁹ 1938 年薩爾摩尼(Alfred Salmony)曾著錄它屬於英國布查德 W. Burchard 收藏(圖 42b)。⁷⁰ 1954，1963，1964 三度被發表。⁷¹ 從 1963、1964 兩次的著錄可知，已歸巴隆 Barlow 收藏。後捐贈至英國的薩賽克斯大學(University of Sussex)，1975 年參與維多利亞博物館舉辦的中國古玉聯展。⁷² 高 19.7 直徑 16.6 孔徑 2.3 公分。黃濬書上的圖片(圖 42a)可能曾經局部修改，故帶翼虎兩側局部雲紋消失。仔細比對多次出版品上的圖片可知，這件玉璧兩面紋飾不完全一樣，1938，1939 公布的這一面(圖 42a, b)上雕有鳥頭，可組成

65 同註 6。

66 南京博物院，〈江蘇盱眙東陽漢墓〉，圖 16：1。

67 鄧淑蘋，〈長樂又延年——東漢吉祥銘文玉璧的新認知〉，頁 64-93。

68 四靈紋中的「玄武」變化最大，流行鑄造四靈紋的漢代銅鏡的情況也相似，在西漢末、新莽時期銅鏡上的玄武紋也還沒有定制。

69 黃濬，〈古玉圖錄初集〉。

70 Alfred Salmony (薩爾摩尼), *Carved Jade of Ancient China*.

71 Jean-Pierre Dubosc, *Exhibition of Chinese Art*. No.221; Michael Sullivan, *Chinese Ceramics, Bronzes and Jades*. Pl.155(a); Coll. Sir Alan and Lady Barlow, Desmond Gure, "Selected Examples from the Jade Exhibition at Stockholm 1963, A Comparative Study," pl.5.

72 John Ayers and Jessica Rawson, *Chinese Jade throughout the Ages*, no. 98.

「四靈紋」，但 1954，1964，1975 年公布的是其另一面，璧面雕琢四個動物，輪替出現龍紋與虎紋。⁷³ 近年薩賽克斯大學將之與其它中國玉器撥交給牛津大學阿什莫林博物館（Ashmolean Museum），2012 年 10 月，筆者親赴該館庫房仔細檢視這件玉璧，玉質白夾灰斑，小局部褐斑，雕工極為精緻。

本文討論雕有四靈紋的一面：璧面分內外二圈，內圈琢乳丁紋，外圈的右側上下分別琢青龍（圖 42-A1）白虎（圖 42-A2a，A2b），左側上下分別琢朱雀（圖 42-A3）玄武（圖 42-A4），全器上方出廓雕琢一帶翼虎。這件玉璧的雕工相當精緻，以多層次淺浮雕描述動感十足的神物，紋飾佈局雖甚飽滿，但佈局和諧。應屬西漢晚期至東漢早期的作品。

圖 43 玉璧由台灣的金華堂收藏，直徑 16.2 孔徑 3.75 厚 0.65 公分。灰夾白色玉，璧面分內外二圈，內圈上下鏤雕篆體「長樂」「未央」二銘；兩側鏤雕龍紋、虎紋。外圈淺浮雕四靈紋；自右下起順時針方向琢青龍（圖 43-B1）白虎（圖 43-B2）朱雀（圖 43-B3）玄武（圖 43-B4）。青龍與朱雀的嘴前，及龍尾與虎尾交纏處之中央，各有一代表元氣的圓珠。背面紋飾相似，但青龍位於正上方，依順時針方向琢白虎、朱雀、玄武。

此件上的玄武紋是「龜與蛇」，蛇頭造形奇特，位於龜的後方。此璧雕琢非常精緻，動物紋以多層次淺浮雕完成，從動物頭部、軀幹的造形及所裝飾的圓點（似豹斑）、鱗片分析，應是西漢晚期至東漢早期作品；「長樂」「未央」聯銘，也是西漢晚期的時尚。此璧曾參加 1999 年臺北故宮舉辦的展覽。⁷⁴

圖 44 玉璧原屬英國的尤默弗普魯斯（George Eumorfopoulos）收藏，後捐贈給英國維多利亞阿伯特博物院（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該館編號為「A22-1935」。高 16.75 直徑 15.6 孔徑 8.34 公分，青白夾褐色玉質，上方出廓鏤雕朱雀的頭部，鳥喙銜著圓珠（圖 44-C3）。與朱雀相對的璧面雕琢代表玄武的龜（圖 44-C4），以朱雀、玄武為中軸，左方雕青龍（圖 44-C1），右方雕白虎（圖 44-C2）。

這件玉璧上雕琢的青龍、白虎紋，與漢代常見於玉璧上的龍、虎紋不類，較相似於漢代陶器、畫像磚上的龍、虎紋。而這種左青龍、右白虎、上朱雀、下玄武的佈局，也正反映漢代流行的帝王坐北朝南的宇宙方位。在動物紋之外的璧面，也精

73 1963 M. Sullivan 出版者，筆者未查到原書。

74 鄧淑蘋，《群玉別藏續集》。

緻地描繪著裊繞的雲氣，暫訂東漢早中期。曾於 1964，1975，2006 三度發表。⁷⁵

圖 45 典藏於臺北的國立故宮博物院藏，編號「中博 307」，意指在清代時可能典藏於瀋陽故宮或避暑山莊，而非北京的紫禁城內。高 16.55 直徑 13.47 孔徑 2.9 厚 0.47 公分，青白夾褐色玉。璧面分內外兩圈，內圈琢乳丁紋，外圈的上下分別鏤雕篆體「長」「樂」二字，「長」字右下角有傷缺；外圈鏤雕四靈紋，四靈的排列順序是：自右上角開始，以逆時鐘方向鋪排。青龍（圖 45-D1）、白虎（圖 45-D2）的頭部出廓於玉璧上方，龍頭在右，虎頭在左，鏤雕的捲雲紋在正中央形成圓弧形掛勾，可供懸掛。璧面外圈的左下角與右下角分別鏤雕朱雀（圖 45-D3）與玄武（圖 45-D4）。

此璧青龍的頭部雕作鳥喙長眉獨角龍，玄武也雕作弓背蛇身的鳥喙長眉獨角小龍，筆者曾根據出土玉器詳考這類表情詼諧的龍紋，應屬東漢晚期風格。⁷⁶

圖 46 也是一件東漢晚期四靈紋璧，曾為清高宗的珍藏，乾隆三十五年（公元 1770 年），皇帝為之賦詩〈詠漢玉延年珮〉，並命造辦處玉工將詩刻在玉璧圓周上，並為之配製紫檀木座。晚清時此璧流散宮外，後曾為臺灣的藍田山房收藏，1995 年出版專書並參與臺北故宮的展覽，⁷⁷ 後又於 2007 年易手。⁷⁸

這件玉璧甚大，高 23.8 直徑 19 孔徑 3.4 厚 0.55 公分。青白夾大片褐色玉，璧面分內外兩圈，內圈琢乳丁紋，外圈的上下分別鏤雕篆體「延」「年」二字，並鏤雕四靈紋，青龍（圖 46-E1）、白虎（圖 46-E2）分居於玉璧上半的右、左，朱雀（圖 46-E3）與玄武（圖 46-E4）分居於玉璧下半的右、左；此外，璧的上方鏤雕另一對龍、虎，龍在左、虎在右，鏤雕的捲雲紋在正中央形成圓弧形掛勾，可供懸掛。

此璧青龍的頭部雕作有大鼻瘤的長眉獨角龍，玄武也雕作弓背蛇身的長眉獨角小龍，屬東漢晚期風格。⁷⁹

以上介紹的五件四靈紋璧，青龍、白虎、朱雀、玄武四種靈物的排列有三種方

75 Desmond Gure, "Selected Examples from the Jade Exhibition at Stockholm 1963, A Comparative Study," pl.6; John Ayers and Jessica Rawson, *Chinese Jade throughout the Ages*, no.99; 劉明倩,《英國國立維多利亞阿伯特博物院中國古玉藏珍》。

76 鄧淑蘋,〈長樂又延年——東漢吉祥銘文玉璧的新認知〉。

77 鄧淑蘋,《藍田山房藏玉百選》。

78 此璧 1990 年 10 月佳士德公司 (Christie's) 在香港拍賣時, 由藍田山房購得。2007 年 4 月再度由蘇埠比 (Sotheby's) 公司在香港賣出。

79 同註 67。

式：

第一種是沿著圓圈排，如圖 43「長樂未央」璧上四靈依順時鐘方向排，但圖 45「長樂」璧的四靈，則依逆時鐘方向排。

第二種是採雙平行直線方式排，這種排法，青龍都在右上角。圖 42 是直排，右行上下為青龍、白虎，左行上下為朱雀、玄武。圖 46「延年」璧則採橫向，上一列從右到左為青龍、白虎，下一列從右到左為朱雀、玄武。後者相同於漢武帝茂陵出土玉鋪首上四靈的排序方式。（圖 47）

第三種是採十字交叉方式排列，就是朱雀在上、玄武在下，連成中央直線（代表南北），龍虎分居兩側。如圖 44 維多利亞藏璧（左龍、右虎）。

漢代是四靈紋發展成熟的時期，在墓葬壁畫、畫像石、畫像磚、陶器、瓦當、銅鏡等藝術品上廣泛出現，佈局方式多變化，但前述第三種採十字交叉方式，分別以青龍、白虎、朱雀、玄武代表：東、西、南、北四個方位的佈局，可能是較晚發展成熟，也是被後世廣為採用的排列方式。⁸⁰

六、漢璧功能的解析與統計

綜合本文第二至五節可知，漢代玉璧從紋飾上可以分為四大類（素璧、幾何紋璧、複合紋璧、鏤雕或出廓神靈動物紋璧）九種（全素璧、弦紋璧、穀紋璧、蒲紋璧、乳丁紋璧、雙身合首夔龍紋璧、鳳紋璧、神靈動物紋璧、四靈紋璧）。在功能上可大致分為禮器、佩飾器、喪葬器三大類，每類功能中又可分為二至五種不同的功能，故細分有十一種功能。表一中按「地支」給這十一種功能各一個代碼如下：（子）被供奉、（丑）祭祀神祇、（寅）正月朝賀、（卯）皇帝贈禮、（辰）佩飾組件、（巳）裝飾門樑或帷帳、（午）鋪排在玉匣內、（未）隨葬於棺內、（申）貼飾棺材、（酉）釘懸棺材頭端、（戌）置於墓主頭端。

在表一的九十九個格子，各以◎符號代表所屬的「橫列」上登記的玉璧，具有所屬的「直欄」上註記的功能。如果甲類玉璧特別常見用於乙類功能，則在格子裡註記兩個◎符號；例如：穀紋璧最常見於人身佩飾，雙身合首夔龍紋璧最常用於隨葬。

80 中國傳統方位是以南方在上方，和現代以北方在上方不同。

目前表一中有註記◎符號者，基本上都有考古實例作為證據，只有一個文獻記載的功能是無法在考古遺址中求證的，所以在◎符號後方加了問號「？」，那就是漢代每年正月諸侯王、列侯們參加朝賀典禮時，手執的「瑱璧」是否正如筆者所推測的「穀紋璧」呢？是有待日後繼續求證的。

從表一可知，功能最多項的是穀紋璧，十一項功能中，它具有六項（丑寅辰巳午未）。其次是雙身合首夔龍紋璧，具有五項功能（丑午未申酉）。四靈紋璧、乳丁紋璧都各具一項功能。表中這十一種玉璧的功能，有漢代以前就形成的，也有在漢代逐漸形成的。

祭祀神祇（丑）與用作佩飾（辰）應是玉璧最古老的功能，萌芽自新石器時代。如前文考證戰國時玉璧就可用作贈禮（卯）。從臨淄商王村戰國墓中現象可知，當時已將多件玉璧隨葬於棺內（未），甚至鋪蓋在墓主臉、胸、腹、腿上。⁸¹ 洛陽中州路戰國墓中，墓主頭端常置放帶中孔的方圓形玉石片，⁸² 被認為是頭端置璧葬俗（戌）的萌芽。⁸³

表一 漢代玉璧紋飾及功能對照表

紋飾分 四類 九種		功能分 三類 十一種	禮器				佩飾器		喪葬器				
			子	丑	寅	卯	辰	巳	午	未	申	酉	戌
			被供奉	祭祀神祇	正月朝賀	皇帝贈禮	佩飾組件	裝飾門樑或帷帳	鋪排在玉匣內	隨葬於棺槨內	貼飾棺材	釘懸棺材頭端	置於墓主頭端
素璧	全素璧		◎		◎					◎		◎	
	弦紋璧				◎								
幾何紋璧	穀紋璧		◎	◎?		◎◎	◎	◎	◎				
	蒲紋璧					◎		◎	◎				
	乳丁紋璧										◎		
複合紋璧	雙身合首夔龍紋璧		◎					◎◎	◎◎	◎	◎		
	鳳紋璧		◎				◎	◎					
鏤雕或出廓神靈動物紋璧	神靈動物紋璧	◎					◎						
	四靈紋璧	◎											

81 淄博市博物館等，《臨淄商王墓地》。

82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洛陽市文物工作隊，〈洛陽西工區 M7602 的清理〉。

83 袁勝文等，〈玉石覆面研究〉，頁 78。

扣除了丑、卯、辰、未、戌這五項漢代以前就已發展的功能，那麼所剩的六項就是在漢代（西元前 206 年至西元 220 年）四百多年內逐漸發展的。裝飾門樑或帷帳（巳）、鋪排在玉匣內（午）、貼飾棺材（申）、釘懸棺材頭端（酉）應是西漢時出現並逐漸普遍的習俗。將玉璧釘貼或懸掛在棺材頭端（酉），是意圖引墓主魂靈穿過璧之中孔昇入天界。東漢時，有些墓葬在棺材頭端釘懸鑄有「天門」字的銅璧，更是此一觀念的明證。⁸⁴

被當作供奉膜拜的對象（子）的玉璧，可能是象徵天地宇宙四靈紋璧或與之相似功能的較大型的神靈紋璧，所以筆者懷疑這是在兩漢之交時發展出來的禮俗。諸侯王、列侯手執玉璧參加正月朝賀典禮的記載（寅），只見於《後漢書》中，⁸⁵ 故筆者懷疑這也是東漢才有的禮俗。

七、從「黃道」到「四象」

（一）璧創形自「黃道」

近年來由於考古學的興盛，發現在新石器時代的許多考古學文化中都製作大量的玉璧，長江下游太湖地區良渚文化晚期的玉璧，上面還出現刻劃得極為輕淺，與天象（鳥、日）或鳥生神話（鳥、柱、卵等）有關的符號。（圖 48、49）

自 1993 年起，筆者曾數度撰述論文探討良渚文化刻符玉璧的文化內涵；⁸⁶ 2006 年又針對圍繞在良渚玉璧周圍，曾被誤稱為「雲紋」的符號作了細緻的比對考證。認為那不是單一條直線連續作方形的回繞，而是有一定佈局的「交互雙 L 形符號」，是兩個用線條構成的「L 形」順著同一方向旋繞，好像人的兩手相互握扣般（圖 48d、49b）。⁸⁷ 這樣「一來一往」「相應合抱」的結構，可能象徵宇宙中陰陽二

84 趙殿增等，〈「天門」考——兼論四川畫像磚（石）的組合與主題〉。

85 同註 9。

86 鄧淑蘋，〈中國新石器時代玉器上的神秘符號〉，頁 1-50。鄧淑蘋，〈由良渚刻符玉璧論璧之原始意義〉，《良渚文化研究——紀念良渚文化發現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集》，頁 202-214。鄧淑蘋，〈刻有天象符號的良渚玉器研究〉，宋文薰等主編，《石璋如院士百歲祝壽論文集——考古·歷史·文化》，頁 123-145。英文發表為：Shu-p'ing Teng, "Incised Emblems on Ritual Jades of the Liangzhu Culture," *New Perspectives on China's Past: Chinese Archaeolog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Editor and Principal Author: Xiaoneng Yang (楊曉能). pp. 171-185.

87 鄧淑蘋，〈反山十二號墓“權杖”玉鐲、玉瑁的啟示〉，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學刊·第八輯·紀念良渚遺址發現七十週年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 349-363。

氣交互運作。⁸⁸

目前已發現邊緣刻有「交互雙 L 形符號」的良渚玉璧共有四件，為節省篇幅，本文僅擇兩件簡介。四件中有三件在邊緣上都刻著頭向一致的二或三隻飛鳥，⁸⁹古代的中國人相信，天上有不只一個的太陽，由鳥兒背著太陽，自東方湯谷的扶木上輪替地飛出。⁹⁰在古代宗教美術品中，多用「鳥」作為「日」的象徵，這已是沒有爭議的共識。因此，這些邊緣刻著象徵「日」的飛鳥的玉璧，就是探索先民思維內涵的重要物證。

《周髀》是一部寫成于戰國秦漢之間，有關天文與數學的古籍；⁹¹但所記載的思想，可溯源自新石器時代。⁹²《周髀》所記述的，是中國最古老的「蓋天宇宙觀」，其中的「七衡圖」是表示太陽每天繞地球運行的幾何圖形。⁹³由於冬夏時，太陽升空的高度不同，故有七條不同半徑的同心圓，正中央即為宇宙中永恒不動的北極。在歷史的流傳中，《周髀》有過許多版本，其中有五種版本的七衡圖，相似于本文圖 50a 所示。

約為東漢末至三國的天文學家趙爽，⁹⁴給《周髀》的七衡圖作了相當長的注，據之可知七衡圖是由兩幅畫一青圖畫與黃圖畫疊合而成，注中明言：「黃圖畫者，黃道也。」據考證，這正是一張以北極為中心的星圖，青圖畫就表示觀者目力所及的範圍，其內外都是天。⁹⁵

七衡圖下方有十九個字：「外方圈實青色，中俱黃色，內北極小圈青色實之」若依指示在所指的部位塗以青、黃二色，所得圖像如圖 50b，中央黃色部份正是一個圓璧。筆者此一發現，揭示了歷史上久被遺忘的真相：玉璧的創形，正源自古人宇宙觀中的「黃道」，也就是「光道」，即是太陽在天上行移的軌迹。⁹⁶

88 筆者懷疑這是後世強調「互補共生」「相反相成」的太極圖的原始構圖。

89 另兩件分別典藏於舊金山亞洲美術館及台灣的藍田山房。註 86 拙文中均有圖解。其中藍田山房藏璧的邊緣有三隻飛鳥。

90 見《山海經·大荒東經》：「湯穀上有扶木，一日方至，一日方出，皆載于鳥。」

91 江曉原、謝筠，《周髀算經》，《中國古代科技名著譯叢》，頁 3-5。

92 馮時，《星漢流年——中國天文考古錄》，《華夏文明探秘叢書》，頁 210。

93 陳遵媯，《中國天文學史》第一冊，頁 151。

94 有關趙爽的年代的考證，見江曉原等 1996，（同註 91）頁 6。

95 陳遵媯 1984，（同註 93）頁 152-153。

96 《漢書·天文志》：「日有中道，月有九行。中道者，黃道，一曰光道。」《後漢書·律曆志》：「日有光道，月有九行，九行出入而交生焉。」

我們可將圖 48f、49d 兩件週緣刻有飛鳥的良渚玉璧，與圖 50 的七衡圖作對比，從玉璧周緣飛鳥（日）的頭向就會瞭解，古人認為當玉璧豎置於眼前時，觀者正是坐北朝南，左手邊是東方，右手邊是西方。正合《周髀》釋七衡圖：「日出左而入右」，⁹⁷ 趙爽注：「聖人南面而治天下，故以東為左，以西為右。」⁹⁸

（二）璧成為「四象」的載體

前文已說明史前玉璧的創形理念源自古人思維中的「黃道」「光道」，其實就是今日天文學中所稱的「周日視運動 Sunday's apparent motion」。真正的原因是地球自轉所造成人們的視覺效果，但史前先民不解此原因，僅直觀地看到太陽東昇西落，漫漫長夜時，太陽再由西回到東方，因而有了太陽因循圓的軌跡運轉的概念。在先民二元對立的思維下，又延伸出「天圓地方」的觀念。⁹⁹

但隨著文化的發展，先民對天象的認識漸趨豐富。也是因為地球是自西向東繞軸自轉，所以人們觀察到天空上的所有天體都繞著這個軸作逆時針方向旋轉，在北斗星為中心的北天極附近，天體的旋轉尤為明顯。因此古人有了「天左旋，地右動」¹⁰⁰ 及斗轉星移的觀念。¹⁰¹ 今日天文學稱這種視覺現象為「天體的周日視運動」。

古代先民為了認識星辰和觀測天象，以北天極為中心，把周圍二十八個星宿，每七個一組分為四組；將之想像成各種神靈動物的形象；（圖 51、52）¹⁰² 更將它們的方位與季節聯繫起來，發展出農業社會中與觀象授時活動密切相關的「四象」的觀念；在民間信仰中更將這種時空運行變化規律用圖像符號等象徵手段表現，發展出「四神」、「四靈」的圖像，多裝飾在象徵宇宙的空間，如皇城宮門、墓葬四周及內部，以及玉璧、銅鏡這類象徵天體的器物上。

97 錢寶琮校點，《算經十書》，頁七四。

98 錢寶琮曾以為古本中的七衡圖，與趙爽的注不合，而另繪七衡圖。西方學者也有類似的觀點，見：Christopher Cullen, *Astronomy and Mathematics in Ancient China: the Zhou Bi Suan Jing*, pp. 221-222; Xiaochun Sun and Jacob Kistemaker, *The Chinese Sky during the Han: Constellating Stars and Society*, p. 24. 但所試繪的新七衡圖，基本上仍是以「極」為中心點的七條同心圓，只是對青圖畫的解釋，略有不同。

99 《呂氏春秋·圓道篇》：「天道圓，地道方，聖王法之，所以立天下。《淮南子·天文訓》：「天道曰圓，地道曰方。方者主幽，圓者主明。」《大戴禮記·曾子天圓》：「天道曰圓，地道曰方。方曰幽而圓曰明。」

100 《春秋緯·天命府》：「天左旋，地右動」。

101 北斗星是七顆亮度甚大的恆星連成酒杓（斗）的形狀，位於北天極，《鶡冠子》《淮南子》中記載，古人觀察北斗星的斗柄指向東、南、西、北，確定季節為春、夏、秋、冬。

102 四象圖像引自：陳久金，《中國星座神話》，2005 年。

有學者綜合考古資料，對古代四象起源作了深入探討；¹⁰³大致可確定四象中龍與虎呈相對佈局的圖象萌芽甚早，約公元前 46 世紀的河南濮陽西水坡仰韶時期墓葬中就有以蚌殼堆塑的龍與虎，¹⁰⁴約公元前 9-7 世紀，西周虢國銅鏡上已有了：龍、虎、鳥、麟；公元前 5 世紀末，湖北曾侯乙墓出土的漆箱上彩繪了龍、虎、麟的圖象。從公元前 3 世紀中葉《呂世春秋》及公元前 2 世紀中葉《淮南子》的記載可知，在戰國晚期至西漢早期麒麟才被龜所取代，發展出以：龍、虎、鳥、玄武為代表的新的四象體系。¹⁰⁵

如前文所述，目前在玉器上找到最早的四靈圖像，是公元前 1 世紀末，漢武帝茂陵玉舖首。¹⁰⁶（圖 45）但此一官方的制度未必通行全國，所以西漢晚期至東漢早期的四靈紋璧，有的如圖 42 牛津大學藏璧那樣，將玄武雕作蛇身的怪物；有的如圖 43 金華堂藏長樂未央璧那樣，將玄武雕成龜與蛇；即或到了東漢晚期，在長樂璧與延年璧上的玄武，都雕作弓背蛇身的鳥喙長眉獨角小龍，（圖 45D4、46E4）或許這樣的短體弓背造形，就隱含了烏龜的意思。

漢代，尤以東漢時期是玉器上出現四靈紋的主要階段，雖然這種紋飾也見於帶扣、玉勝等，¹⁰⁷但更常利用象徵「天」或「宇宙」的圓璧，作為代表方位、季節的四象（即四靈紋）的載體。

結 論

總之，史前先民按照他們看到的太陽行移的圓形軌跡，也就是「黃道」，創造了玉璧，隨著時代的演進，在商、西周、春秋時期，玉璧上雕琢了同心圓、龍紋、雲紋等紋飾。戰國時，更發展出穀紋璧、蒲紋璧、雙身合首夔龍紋璧、以及鏤雕及出廓神靈動物紋璧，西漢時又增加了乳丁紋璧以及複合紋璧中的鳳紋璧；漢代時，鏤雕及出廓神靈動物紋璧花樣百出，西漢晚期以降，隨著天象觀念的演進，玉璧成

103 馮時，《中國天文考古學》，第六章。

104 西水坡資料中比較確定的是用蚌堆塑的龍與虎，但馮時在 2001 年其著作第 313 頁記述：「在濮陽西水坡與蚌塑星象圖共存的另一處遺跡中，曾經發現了龍、虎、鳥和銀河，這無疑也是一幅天象圖。但是這裡出現的鳥到底是作為二十八宿中的哪些星官的形象，目前還不好確定。…」

105 同註 103，頁 320。

106 漢武帝卒於公元前 87 年。

107 四靈紋帶扣藏於臺北的國立故宮博物院，見：錢伊平，《中華五千年文物集刊·玉器篇·漢代》。四靈紋玉勝藏於上海博物館，見：王正書，〈司南佩考實〉，頁 69-72。褚馨，〈兩漢六朝玉器中的四靈、五靈紋樣〉，頁 66-73。

了「四象」的載體，雕琢了精美的四靈紋。

從考古資料分析，漢代時，素璧仍具有最高的禮制意義，用以祭祀自然神祇及祖先，更可能是皇帝賞賜臣屬的贈禮，由禮官送到喪家，埋於墓中以象徵墓主高貴的身份。穀紋璧的功能最廣，既可作為純裝飾的佩飾，又可與複合紋璧中的雙身合首夔龍紋璧、鳳紋璧一樣，作為祭祀的禮器，也可作為喪葬用玉；縫在玉匣頭端的穀紋璧，蓋在亡者頭頂，中孔供靈魂通過，認為具有引魂昇入天界的法力。蒲紋璧也可作為佩飾，但更常用於葬禮中。乳丁紋璧發展較遲，主要用於葬禮。

文獻記載諸侯王、列侯在正月朝賀時要手捧瑄璧，瑄璧上究竟雕了什麼樣的紋飾呢？因為根據記錄，瑄璧的直徑約今日 14 公分，因此筆者推測，瑄璧應是穀紋璧的機率最大。

鏤雕及出廓神靈動物紋璧，可懸掛在帷帳、宮門上，除了裝飾功能外，應該也具有辟邪惡、招吉祥的意義；有的上方不具有圓弧形掛勾，則應是用以供奉膜拜的玉寶璧。將代表四個方位、四個季節的四靈紋雕在玉壁上，無論用以懸掛裝飾或供奉，都說明漢代是個神仙方術思想非常盛行的時代。

魏晉還承襲了一些漢代的制度，五胡亂華之後，在南北朝、隋唐、五代近七個世紀中，在外來文化強力衝擊下，中國本土的玉器文化較為消沈，但帝王祭祀自然神祇，或帝王的陵墓中，仍見禮儀性玉璧的使用。1931 年，在山東泰安蒿里山出土唐玄宗禪地祇玉冊時，據記載當時有玉璧伴隨出土，可惜該璧已不知去向。¹⁰⁸ 目前考古發掘僅見唐僖宗靖陵出土一面雕龍紋、一面雕鳳紋的琉璃璧。¹⁰⁹ 從浩瀚的歷史文獻可知，各朝代的社會上層貴族，都延續著在墓葬中隨葬玉璧的禮俗。¹¹⁰

宋代以來，新儒學（又稱為「理學」）運動興起，文人們重新審視中國最遠古、最本土的思想與信仰。萌芽於新石器時代「氣」的生命觀，被借用而發展出

108 唐玄宗玉冊與宋真宗玉冊均於 1931 年意外地出土於蒿里山一個被炸毀的塔基下，當時為馬鴻逵將軍所得。馬將軍日後帶往美國，1971 年馬將軍遺孀劉慕俠女士將之送回臺灣，由國立故宮博物院典藏，隨著玉冊捐贈時的一份手寫紀錄中記載當初層伴隨出土玉璧。筆者還曾親自目睹該份記錄。鄧淑蘋，〈唐宋玉冊及相關問題〉，頁 12-25。〈唐宋玉冊及相關問題〉，頁 12-25。

109 劉雲輝，《北周隋唐京畿玉器》，頁 140。

110 從《新唐書·志第三十八·百官三》記載「既引，遣使贈於郭門之外，皆有束帛，一品加璧。」可知，對於一品的官吏去世後，中央派使者贈送的贈禮中要增加玉璧。從《宋史·志第七十七·禮二十七·凶禮三》記載「諸一品、二品喪，敕備本品鹵簿送葬者，以少牢贈祭於都城外，加璧，束帛深青三、纁二。」可知，對一品、二品的官吏去世後，中央派使者贈送的贈禮都加玉璧。

「理是宇宙萬物的起源」的說法。¹¹¹ 遠古先民將蘊藏「精氣」的美玉用作與神祇祖先溝通的「靈媒」，各類玉器中，圓璧是表達「天旋」與「太一」宇宙觀最具象的玉器，龍、虎等紋飾，以及演變出來的雲紋、穀紋，更是宇宙中生生不息「氣」的表徵。

宋代士大夫熱衷於考證上古典章制度，自然掀起仿作古物的風尚。虎紋，這個在南北朝至五代的玉器雕琢界幾乎被遺忘的神靈動物圖像，¹¹² 在十三世紀的南宋玉璧上再度成為與龍紋分庭抗禮的主角。¹¹³ (圖 53) 有數千年歷史的圓璧造形，配上有數千年歷史的龍、虎主題，南宋玉璧上的龍頭仍作側面，虎仍是梯形腦袋，牠們的身軀依舊扭轉矯健，但與漢璧上的龍、虎造形，已有明顯不同的時代風格。玉璧，在歷史的洪流中永遠不被淘汰，這個神秘的器物，在中國文化中實在具有永恆的崇高地位。

111 理學的核心內容為：“理”是宇宙萬物的本源，是第一性的；“氣”是構成宇宙萬物的材料，是第二性的。可參考：孫開泰等，《中國哲學史》，頁 256-257。

112 僅在墓葬周圍石刻或墓中壁畫裡，有關四靈主題的裝飾中才會出現白虎紋樣。

113 〈從「西域國手」與「專諸巷」論南宋玉雕的關鍵意義〉，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主編《考古學研究（九）·慶祝嚴文明先生八十壽辰論文集》。

引用書目

一、古籍文獻

- (秦) 呂不韋,《呂氏春秋》,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65。
- (漢) 司馬遷,《史記》,臺北:鼎文書局,1990。
- (漢) 班固,《漢書》,臺北:鼎文書局,1986。
- (漢) 許慎撰,(清) 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臺北:天工書局,1998。
- (漢) 許慎注,《淮南子》,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5。
- (南朝宋) 范曄,《後漢書》,臺北:鼎文書局,1987。
- (晉) 郭璞,《山海經》,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5。
- (宋) 陸佃注,《鶡冠子》,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5。
- (宋) 歐陽修、宋祁同撰,《新唐書》,臺北:鼎文書局,1989。
- (元) 脫脫等,《宋史》,臺北:鼎文書局,1983。
- (清) 阮元校勘,《十三經注疏》,臺北縣:藝文印書館,1979。
- (清) 喬松年輯,《春秋緯》,臺北:新文豐出版社,1989。
- (清) 游藝撰,《天經或問前集》,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文淵閣四庫全書》。
- (清) 錢大昭,《續漢書藝文志》,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5。

二、近代論著

- 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曲阜魯國故城》,濟南:齊魯書社,1982。
-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中國考古學·新石器時代卷》,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0。
-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大葆台漢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
-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洛陽中州路》,北京:科學出版社,1959。
-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漢杜陵園遺址》,北京:科學出版社,1993。
-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河北省文物管理局編輯,《滿城漢墓發掘報告》,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
- 王正書,〈司南佩考實〉,《文物》,2003年10期,頁69-72。
- 王永波,〈成山玉器與日主祭——兼論太陽神崇拜的有關問題〉,《文物》,1993年第1期,頁62-68。
- 王時麒、員雪梅,〈和闐碧玉的物質組成特徵及其地質成因〉,《寶石和寶石學雜誌》,10卷3期,2008年9月,頁4-7。
- 王愷,〈淺說徐州獅子山楚王墓出土玉器〉,收入鄧聰主編,《東亞玉器·II》,香港:香港中

- 文大學，1998，頁 137-150。
- 丘光明，《中國古代度量衡》，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4。
- 古方主編，《中國出土玉器全集·11》，北京：科學出版社，2005。
- 白寶玉等，〈遼寧普蘭店姜屯漢墓（M45）出土玉覆面復原研究〉，《文物》，2012年7期，頁 69-73。
- 早期秦文化聯合考古隊，〈2004年甘肅禮縣鸞亭山遺址發掘主要收穫〉，《中國歷史文物》，2005年5期，頁 4-14、89-97。
- 江曉原、謝筠，《周髀算經》，《中國古代科技名著譯叢》，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6年。
- 宋少華，〈長沙西漢漁陽墓相關問題雜議〉，《文物》，2010年4期，頁 59-63。
- 李春雷，〈江蘇徐州獅子山楚王陵出土鑲玉漆棺的推理復原研究〉，《考古與文物》1999年1期，頁 55-71。
- 李銀德，〈漢代玉棺與鑲玉漆棺〉，臺灣大學理學院，《海峽兩岸古玉學會議論文集》，臺北：臺大出版社，2001。
- 谷嫻子等，〈徐州獅子山楚王陵出土金縷玉衣和鑲玉漆棺的玉料組分特徵及產地來源研究〉，《文物保護與考古科學》，2010年4期，頁 54-63。
- 俞偉超主編，《考古類型學的理論與實踐》，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
- 南京博物院，〈江蘇盱眙東陽漢墓〉，《考古》，1979年5期，頁 412-426、483-486。
- 咸陽博物館，〈漢平陵調查簡報〉，《考古與文物》，1982年4期，頁 45-49。
- 洛陽市文物工作隊，〈洛陽西工區 M7602 的清理〉，《文物》，2004年第7期，頁 12-16、97。
- 孫開泰等，《中國哲學史》，臺北：文津出版社，1995。
- 孫機，《漢代物質文化資料圖說》，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
- 徐湖平主編，殷志強編著，《古玉菁華——南京博物院玉器館展品選萃》，南京：南京新人類廣告文化藝術有限公司，2000。
- 徐琳，〈漢代玉器的藝術風格〉，《文物天地》，總第 250 期，2012 年 4 月，頁 22-26。
- 烟台市博物館，〈烟台市芝罘島發現的一批文物〉，《文物》，1976 年 8 期，頁 93-94。
- 袁勝文等，〈玉石覆面研究〉，《中原文物》，2009 年 3 月，頁 78。
- 梁云，〈對鸞亭山祭祀遺址的初步認識〉，《中國歷史文物》，2005 年 5 期，頁 15-31。
- 淄博市博物館等，《臨淄商王墓地》，濟南：齊魯書社，1997。
- 陳久金，《中國星座神話》，臺北：臺灣古籍出版社，2005。
- 陳遵媯，《中國天文學史》第一冊，臺北：明文書局，1984。
- 馮時，《星漢流年——中國天文考古錄》，《華夏文明探秘叢書》，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

- 馮時，《中國天文考古學》，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
- 黃濬，《古玉圖錄初集》，北平：北平尊古齋，1939。
- 葉茂林，〈再談齊家文化玉器〉，《中國文物報》，2006年5月10日，6版。
- 漢陽陵博物苑、王保平主編，《漢陽陵博物苑》，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
- 褚馨，〈兩漢六朝玉器中的四靈、五靈紋樣〉，《故宮文物月刊》，總號349，2012年4月，頁66-73。
- 趙殿增、袁曙光，〈「天門」考——兼論四川畫像磚（石）的組合與主題〉，《四川文物》，1990年6月。
- 劉明倩，《英國國立維多利亞阿伯特博物院中國古玉藏珍》，南寧：廣西美術出版社，2006。
- 劉雲輝，《北周隋唐京畿玉器》，重慶：重慶出版社，2000。
- 劉雲輝，《陝西出土漢代玉器》，北京：文物出版社、眾志美術出版社，2009。
- 劉慶柱、李毓芳，《西漢十一陵》，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1987。
- 潘偉斌，〈曹操高陵〉，收入國家文物局編，《2009中國重要考古發現》，北京：文物出版社，2010。
- 蔣廷瑜等，〈廣西先秦兩漢玉器略說〉，收入鄧聰主編，《東亞玉器·II》，香港：香港中文大學，1998，頁111-118。
- 鄧淑蘋，〈中國新石器時代玉器上的神秘符號〉，《故宮學術季刊》，10卷3期，1993年春季號，頁1-50。
- 鄧淑蘋，〈反山十二號墓“權杖”玉鐏、玉瑁的啟示〉，收入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學刊·第八輯·紀念良渚遺址發現七十週年學術研討會文集》，北京：科學出版社，2006，頁349-363。
- 鄧淑蘋，〈史前至夏時期璧、琮時空分佈的檢視與再思〉，楊晶、蔣衛東執行主編，《玉魂國魄——中國古代玉器與傳統文化學術討論會文集（四）》，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
- 鄧淑蘋，〈由良渚刻符玉璧論璧之原始意義〉，收入《良渚文化研究——紀念良渚文化發現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集》，北京：科學出版社，1999。
- 鄧淑蘋，〈刻有天象符號的良渚玉器研究〉，收入宋文薰等主編，《石璋如院士百歲祝壽論文集——考古·歷史·文化》，臺北：南天書局，2002。英文發表為：Teng, Shu-p'ing, "Incised Emblems on Ritual Jades of the Liangzhu Culture," *New Perspectives on China's Past, Chinese Archaeolog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Editor and Principal Author: Xiaoneng Yang (楊曉能)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4. pp. 171-185.
- 鄧淑蘋，〈長樂又延年——東漢吉祥銘文玉璧的新認知〉，《故宮文物月刊》，13卷10期，總號151，1996年1月，頁64-93。
- 鄧淑蘋，〈唐宋玉冊及相關問題〉，《故宮文物月刊》，9卷10期，總號106，1992年1月，

頁 12-25。

鄧淑蘋，〈從「西域國手」與「專諸巷」論南宋玉雕的關鍵意義〉，收入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主編《考古學研究（九）·慶祝嚴文明先生八十壽辰論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2012。

鄧淑蘋，《群玉別藏續集》，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99。

鄧淑蘋，《藍田山房藏玉百選》，臺北：年喜文教基金會，1995。

鄧淑蘋、張麗端、蔡慶良，《敬天格物——中國歷代玉器導讀》，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11。

盧兆蔭，〈剔透玲瓏玉寶璧——漢玉漫談〉，《文物天地》，1993年3期，頁16-18。亦收於氏著，《玉振金聲——玉器·金銀器考古學研究》，北京：科學出版社，2007。

盧兆蔭，〈略論漢代的玉璧〉，收入《中國考古學論叢——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建所四十週年紀念》，北京：科學出版社，1993，頁379-389。亦收於氏著，《玉振金聲——玉器·金銀器考古學研究》，北京：科學出版社，2007。

盧兆蔭，〈略論漢代禮儀用玉的繼承與發展〉，《文物》，1998年3期，頁43-48。亦收於氏著，《玉振金聲——玉器·金銀器考古學研究》，北京：科學出版社，2007。

錢伊平，《中華五千年文物集刊·玉器篇·漢代》，臺北：中華五千年文物集刊編輯委員會，1991。

錢寶琮校點，《算經十書》，北京：中華書局，1963。

Ayers, John and Jessica Rawson. *Chinese Jade throughout the Ages*. London: Oriental Ceramic Society, 1975.

Cullen, Christopher. *Astronomy and Mathematics in Ancient China: the Zhou Bi Suan Jing*.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Dubosc, Jean-Pierre. *Exhibition of Chinese Art*. Venice: Alfieri Editore, 1954, No.221.

Gure, Desmond. "Selected Examples from the Jade Exhibition at Stockholm 1963, A Comparative Study." Stockholm: Bulletin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1964.

Rawson, Jessica. "The Eternal Palaces of the Western Han: A New View of the Universe." *Artibus Asiae*, vol. LIX, 1/2, 1999, pp. 5-58. (中譯) 杰西卡·羅森，〈西漢的永恆宮殿——新宇宙觀的發展〉，收入《祖先與永恆》，上海：三聯書店，2011。

Salmony, Alfred. *Carved Jade of Ancient China*. Berkeley: Gillick Press, 1938.

Sullivan, Michael. *Chinese Ceramics, Bronzes and Jades*. London: Faber & Faber Limited, 1963.

Sun, Xiaochun and Jacob Kistemaker. *The Chinese Sky during the Han*. Leiden, Netherlands: E.J. Brill, 1997.

Han Jade *Bi* Discs and the Significance of *Bi* Discs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Culture

Teng Shu-p'ing
Department of Antiquities
National Palace Museum

Abstract

From the initial stage of ancient jade *bi* discs during the early part of the late Neolithic period six to seven thousand years ago, well into Han Dynasty when jade culture enjoyed a highly advanced stage amid expanding national power and overall advancing culture, *bi* had remained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jade articles after more than four thousand years' development. Much study still leaves unanswered several questions regarding the Han jade *bi* discs, which the author divides into four major categories and nine sub-categories by their patterns, and again three major categories and eleven sub-categories based on their functions as recorded in the ancient literature and archaeological phenomena. The aim is to analyze correlations between the patterns and functions of jade *bi* discs, and to briefly describe the gradual development of *bi* variety in function.

The compositions of the mystic codes carved on the jade discs from the late Liangzhu culture (2600-2300 B.C.E.), and the “*Qi-Heng*” diagram 「七衡圖」 in the *Zhou Math* 《周髀》 inform us that the form of *bi* originated from the human concept about the sun's orbit in the sky, so-called the “Yellow Path” or “Path of Light”. As early people's knowledge of celestial phenomena gradually progressed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culture, they further observed that the twenty-eight constellations could be grouped into four quadrants, corresponding to the rules of seasons and astronomical configurations followed by an agrarian society. Moreover, the spatial and temporal regularities were expressed in symbolic signs and charts, from which came the iconography of the “Four Divine Creatures”. The latter imagery was very popular in Han Dynasty and mostly decorated the spaces or articles that signified celestial bodies. *Bi* discs with Four-Divine-Creature Patterns were among the most representative articles produced amid this trend.

The native culture went quiet during the Chinese Middle Ages. Then Neo-Confucianism in the Song Dynasty revived the remotest and the most native beliefs and thoughts; jade *bi* discs patterned with dragons and/or tigers received much attention again. The mystic *Bi*, staying alive forever in the currents and undercurrents of history, possesses an everlasting noble status in Chinese culture.

Keywords: Jade *Bi* Disc, the Ecliptic/Zodiac, Four Divine Creatur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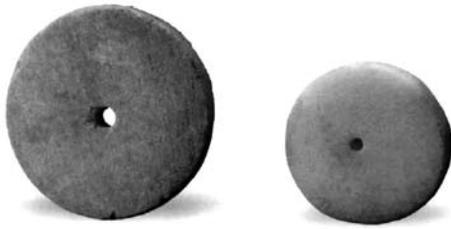


圖1 西漢 石璧（二件）直徑3.7-4.8 孔徑0.4
厚0.4公分 漢景帝陽陵建築遺址出土



圖2 西漢 石璧（二件）直徑9.2 孔徑2.6
厚0.4公分 漢景帝陽陵18號從葬坑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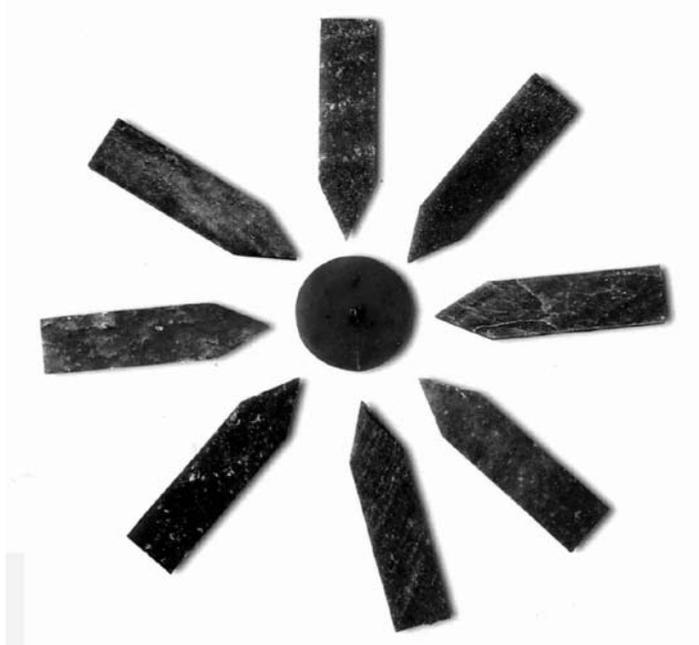


圖3 西漢 玉璧、玉圭（一組） 漢昭帝平陵陵園內出土
璧：直徑4.5 孔徑0.7 厚0.4公分
圭：高9.2 寬2.3 厚0.3-0.5公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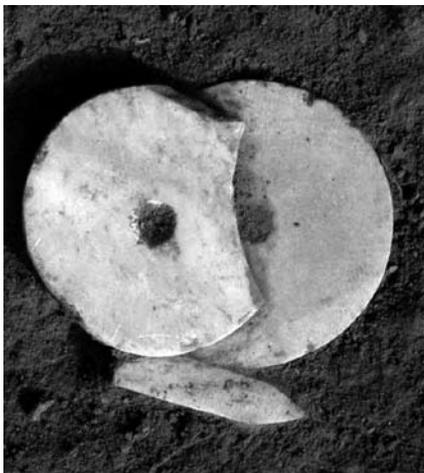


圖4 西漢 白石璧2件白石圭1件 直徑
甘肅禮縣鸞亭山祭天遺址出土



圖5 西漢 玉璧 直徑13.4 孔徑5.3
厚0.6公分 西漢集靈宮遺址出土



圖6 西漢 石璧 直徑13.3 孔徑5 厚0.8公分
西漢集靈宮遺址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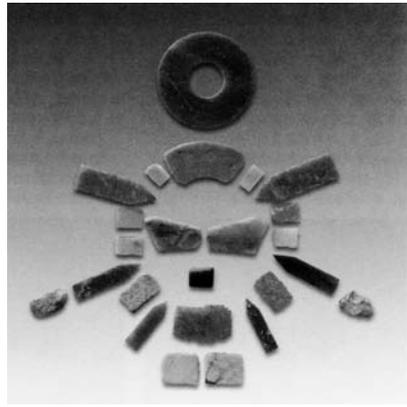


圖7 西漢晚期 玉璧（直徑9.6公分）與玉覆面
大連普蘭店市出土



圖8 西漢 玉素璧 直徑14 孔徑2.5 厚0.3公分
西漢中山靖王劉勝墓棺槨之間出土，為圖一0
平面圖中第107號（該墓編號1：510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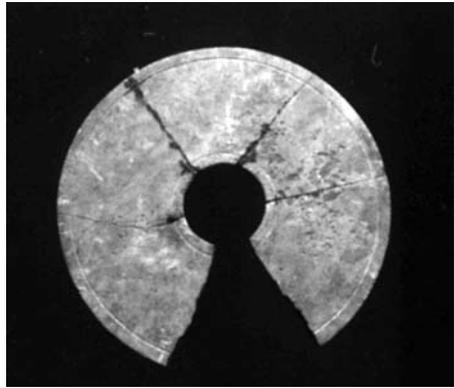


圖9 東漢末年 玉石璧 直徑28.8 孔徑7.2 厚1.1公分
曹操高陵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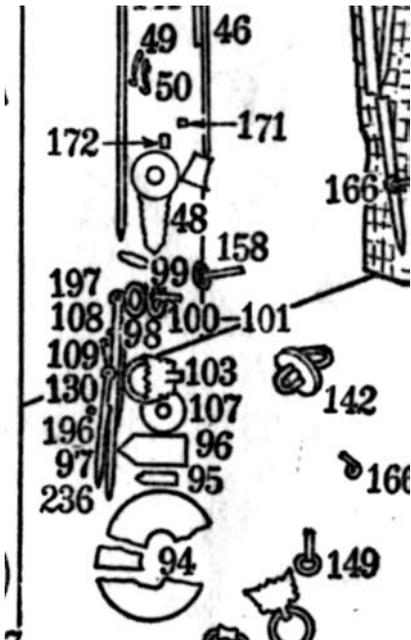


圖10 西漢中山靖王劉勝墓棺槨之間局部平面圖，
顯示48，94，98，107四件玉璧，225號玉璧
壓在107號玉璧下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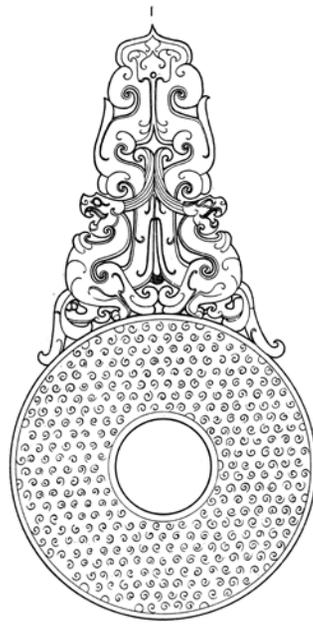


圖11 西漢中期 透雕雙龍穀紋璧 高25.9 直徑13.4
孔徑4.2 厚0.6公分 為圖10中第48號
（該墓編號1：5048）



圖12 西漢中期 鳳紋璧 直徑14.2
孔徑1.8 厚0.4公分 此璧壓在107
號素璧下方，故在圖10中無標示
(該墓編號1：52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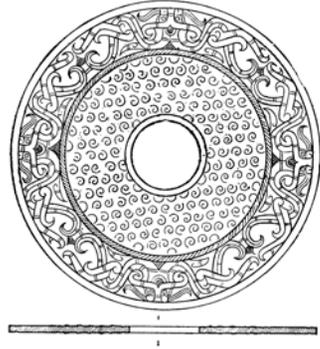


圖13 西漢中期 雙身合首夔龍紋璧 直徑22.1
孔徑5.1 厚0.45公分 是圖10中第94號
(該墓編號1：509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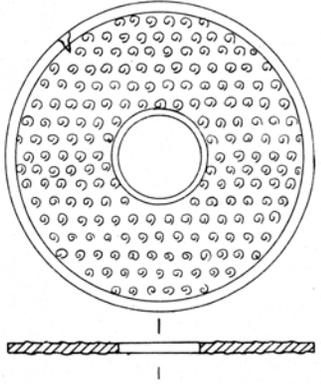


圖14 秦 穀紋玉璧 外徑13.9 孔徑3.7
厚0.4公分 山東成山頭出土B組玉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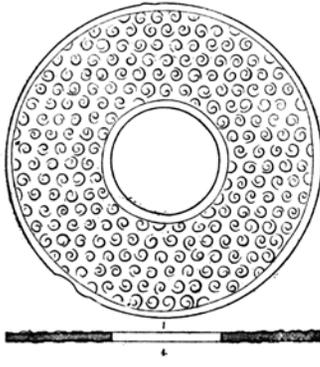


圖15 西漢中期 穀紋玉璧 直徑14.1 孔徑4.7
厚0.4公分 出土於劉勝墓玉衣內胸部
(該墓編號1：520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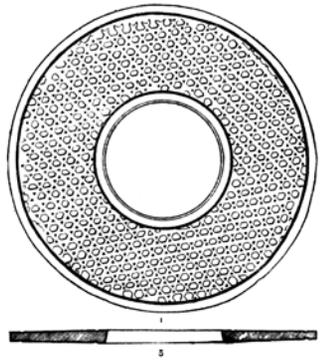


圖16 西漢中期 蒲紋璧 直徑14.2 孔徑5.2
厚0.4公分 出土於劉勝墓玉衣內胸部
(該墓編號1：52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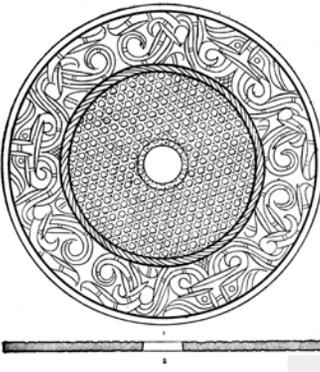


圖17 西漢中期 雙身合首夔龍紋璧 直徑21.2
孔徑2.6 厚0.6公分 出土於劉勝墓玉衣
內背部 (該墓編號1：52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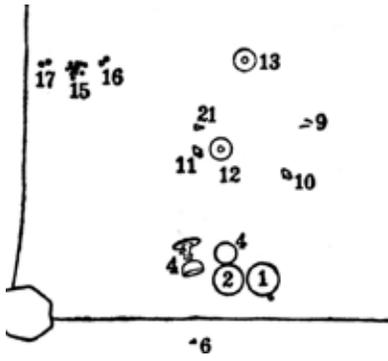


圖18 滿城第二號漢墓（竇綰）中室南端局部，12，13號為兩件穀紋璧，1，2，4為銅釜、銅鉢、銅博山爐、9為骨料、10，11為銅儀仗頂飾、21為梨形骨片、15，16，17分別為金餅、石餅、陶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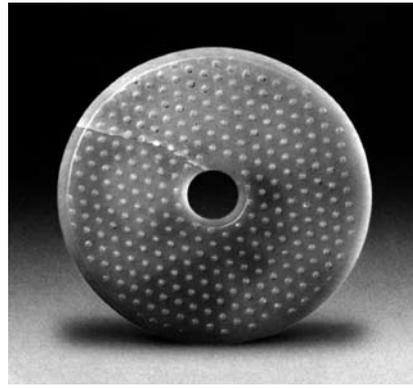


圖20 東漢 乳丁紋璧
直徑17.5 孔徑1.9 厚0.8公分
陝西周至縣城關鎮東漢墓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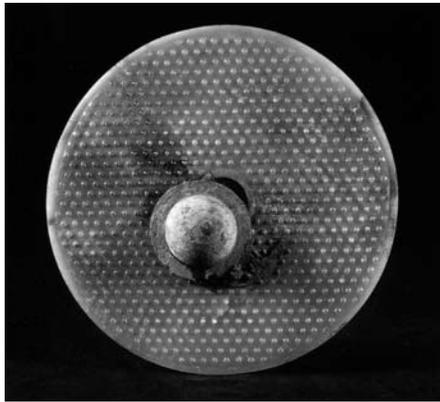


圖19a 西漢晚期 乳丁紋璧
全器（帶銅泡） 直徑22公分
神居山二號墓出土（西元前54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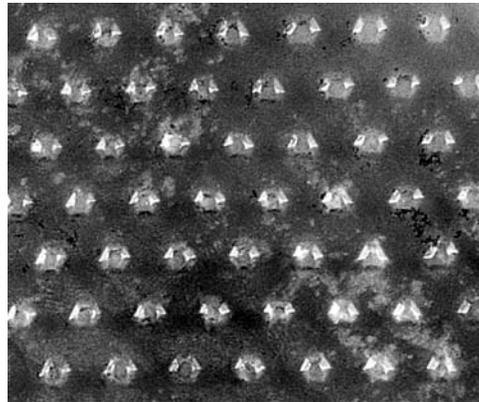


圖19b 西漢晚期 乳丁紋璧 局部



圖21 戰國中期 雙身合首夔龍紋璧 直徑27.7 孔徑4.4公分 魯故城M58出土
a：全器 b：一個單元紋飾（中央雙尾龍、兩側蛇體鳳）
c：線繪示意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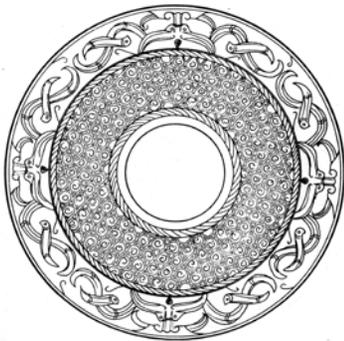


圖22 戰國晚期 雙身合首夔龍紋璧
直徑19.4 孔徑5.7 厚0.5公分
商王村出土



圖23 戰國晚期 雙身合首夔龍紋璧
直徑19 孔徑4.4 厚0.5公分
商王村出土



圖24 波斯波利斯發現的獅首雕刻



圖25 西伯利亞阿爾泰巴澤雷克地區一組浮雕線繪圖（演變順序約自左至右）



圖26 西漢 徐州市獅子山楚王陵出土玉璧上的一個雙身合首夔龍紋



圖27 商後期 獸面紋壺器身上截拓片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中銅187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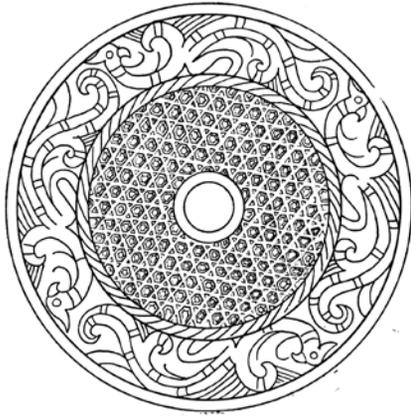


圖28 西漢中期 鳳紋玉璧 外徑16 孔徑1.9
厚0.5公分 出土於寶綰墓玉衣內胸部
(該墓2:416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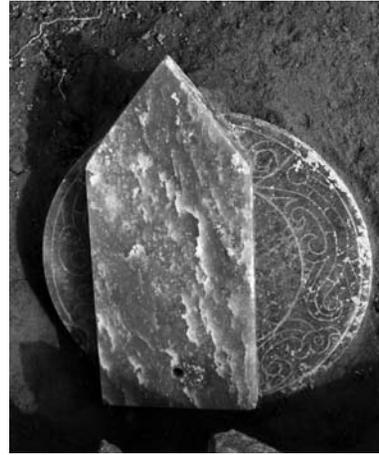


圖29 西漢 玉圭與鳳紋玉璧一組
出土於鸞亭山祭祀坑



圖30 西漢 雙身合首夔龍紋璧 直徑14.3
孔徑2 厚0.5公分 成山頭出土A組
禮器中的玉璧



圖31 西漢中期 雙身合首夔龍紋璧
直徑19 孔徑3.3 厚0.3公分
出土寶綰墓玉衣內胸部(該墓2:415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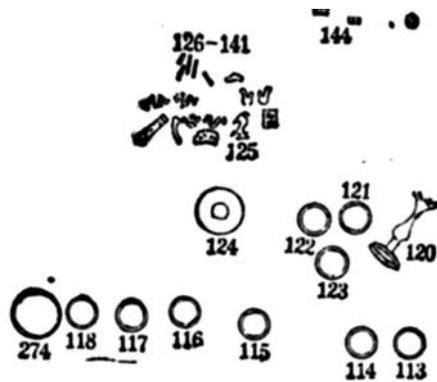


圖32 滿城第一號漢墓(劉勝)中室中部, 124號為蒲紋鳳紋複合紋璧, 113-118, 120燈、121-123
陶燈, 274燈, 125對獸形飾件, 126-141玉飾, 144銅飾



a

b

圖33 西漢中晚期 鏤空虎紋小璧 直徑8.2 孔徑3.85 厚0.3公分 江蘇省泗陽陳墩漢墓出土



圖34 戰國晚期至西漢早期 龍鳳紋穀紋璧 寬10.2 直徑7.2 孔徑4.1 厚0.3公分 南越王墓出土

圖35 戰國晚期至西漢早期 鳳紋穀紋小璧 寬7.8 直徑5.7 孔徑3.1厚0.3公分 南越王墓出土



a

b

圖36 東漢早期 虎紋乳丁紋璧 高25.5 寬19.9 厚0.7公分
a：全器 b：二個相對的虎頭 河北省定縣北庄中山簡王劉焉墓（西元90年）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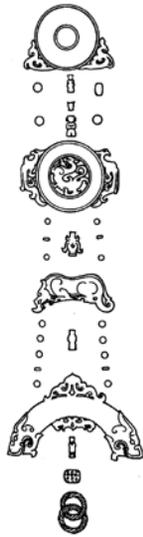


圖37 西漢早期組玉佩 南越王所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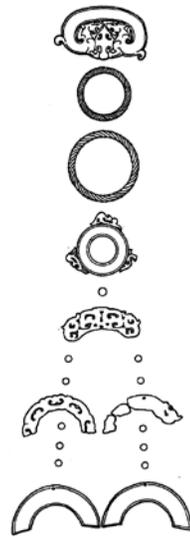


圖38 西漢早期組玉佩 南越王右夫人所佩



a



b

圖39 西漢晚期至新莽 「宜子孫日益昌」玉璧 高27 直徑18.3 厚0.6公分
a: 全器 b: 二個相背的虎頭 廣西合浦黃泥崗1號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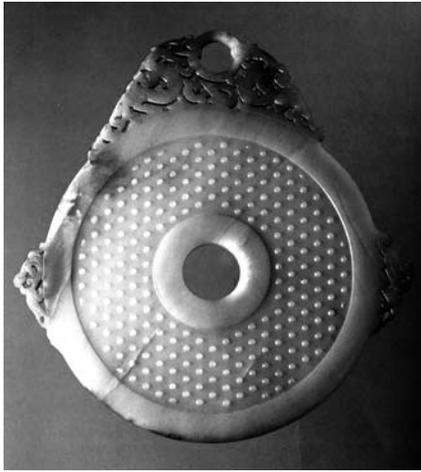


a



b

圖40 西漢晚期 虎紋玉佩 長8.9公分
a: 全器 b: 虎頭 北京市豐台區大葆台2號墓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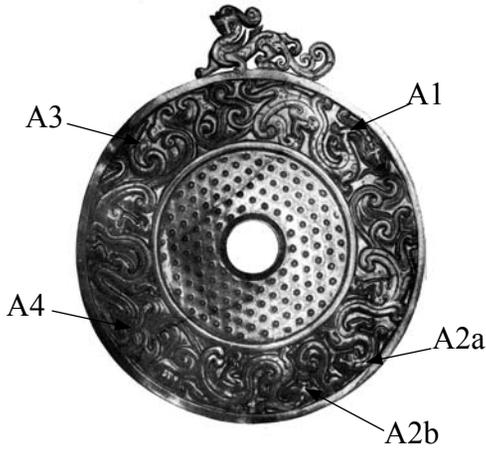


a



b

圖41 東漢晚期 龍虎紋玉璧 高30.5 直徑24.4 厚1.1公分
a: 全器 b: 出廓部位雕為龍首(左)與虎首(右)
河北省定縣中山穆王劉暢墓(西元174)出土



b



A1



A2a



A2b



A3



A4

圖42 牛津大學藏四靈紋璧 西漢晚期至東漢早期 a: 1939年發表圖 b: 1938年發表圖
A1 青龍頭部 A2a A2b 白虎頭部 A3 朱雀頭部 A4 玄武頭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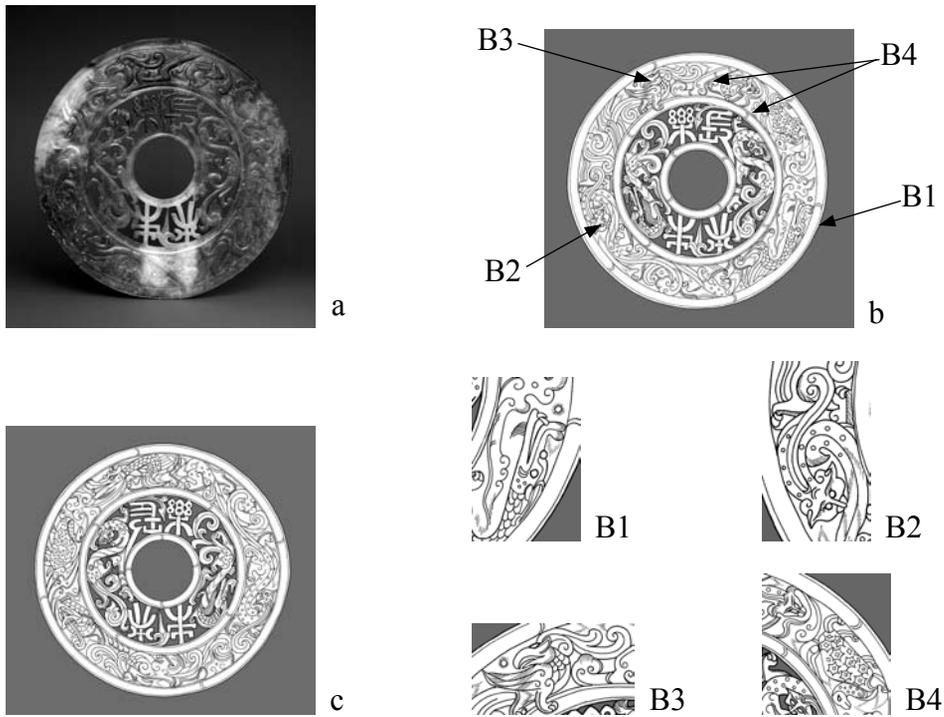


圖43 金華堂藏「長樂未央」璧 西漢晚期至東漢早期 a: 照片 b, c: 正、反面線繪圖
 B1 青龍頭部 B2 白虎上半身 B3 朱雀上半身 B4 玄武(龜與蛇的頭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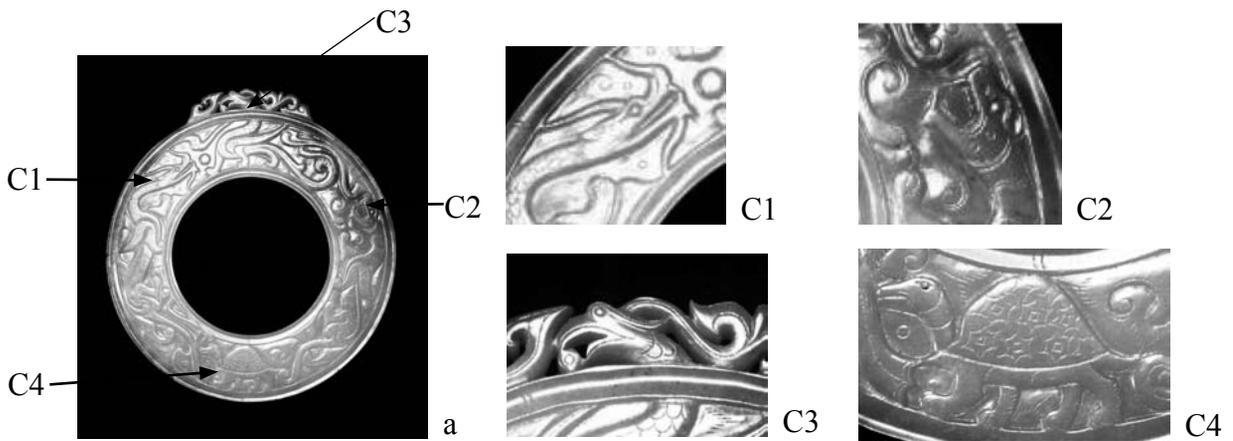


圖44 維多利亞博物館藏四靈紋璧 東漢早中期 a: 照片
 C1 青龍頭部 C2 白虎上半身 C3 朱雀頭部 C4 玄武(龜全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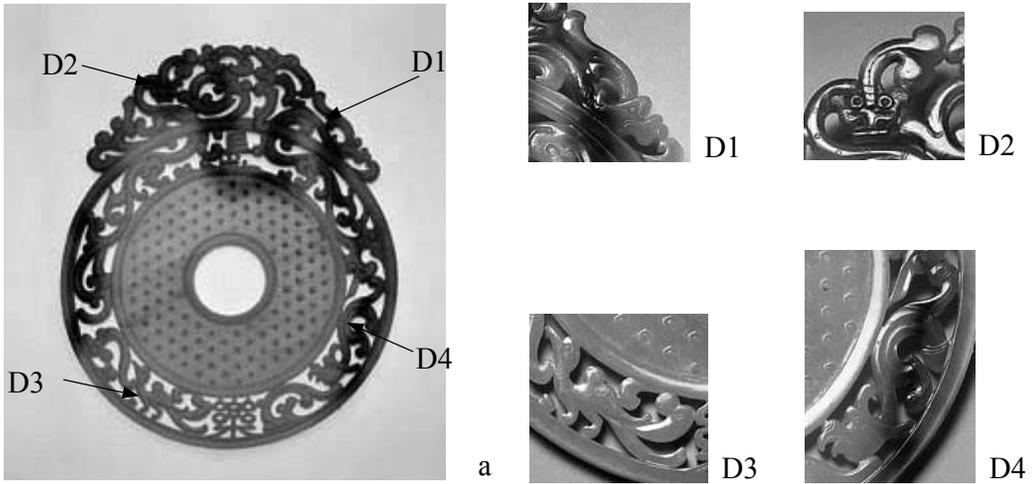


圖45 臺北故宮藏「長樂」璧 東漢晚期 a: 照片
 D1 青龍頭部 D2 白虎頭部 D3 朱雀全身 D4 玄武(弓背蛇全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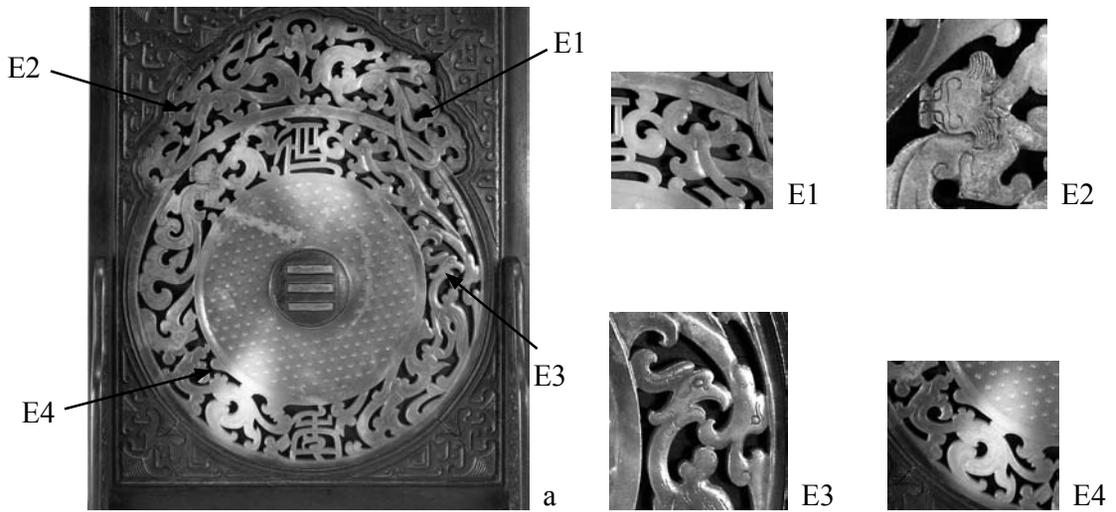


圖46 藍田山房「延年」璧 東漢晚期 a: 照片
 E1 青龍頭部 E2 白虎頭部 E3 朱雀頭部 E4 玄武(弓背蛇全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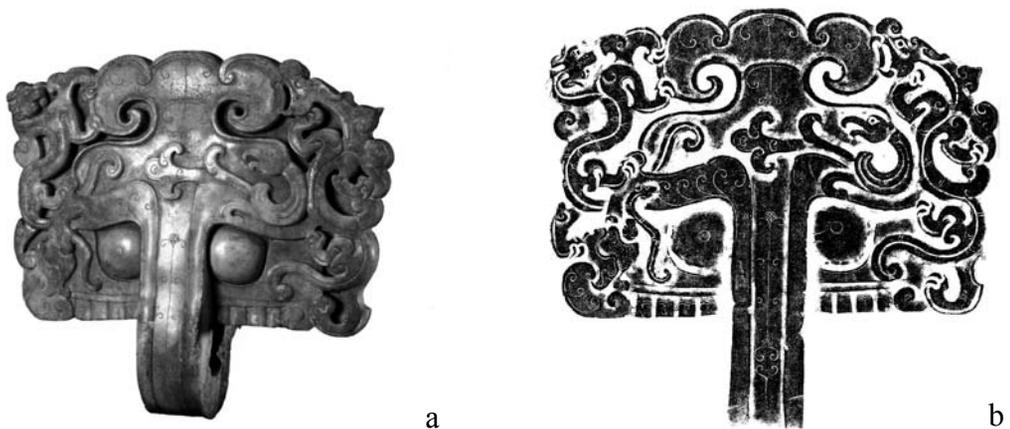


圖47 西漢中期 四靈紋玉鋪首 高34.2 寬35.6 厚14.7公分
 a: 全器 b: 拓片 茂陵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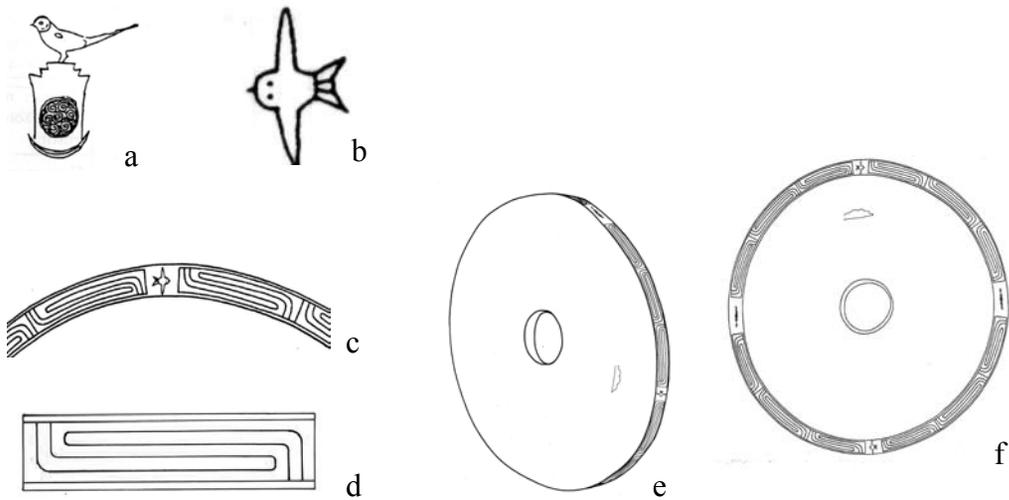


圖48 弗利爾博物館藏良渚玉璧及其符號 a：鳥立祭壇符號 b：飛鳥符號 c：飛鳥與「交互雙L形符號」 d：「交互雙L形符號」的結構分析 e：玉璧半側面 f：若將窄邊所刻各符號依相對位置圍繞於玉璧外圍，可看出符號的佈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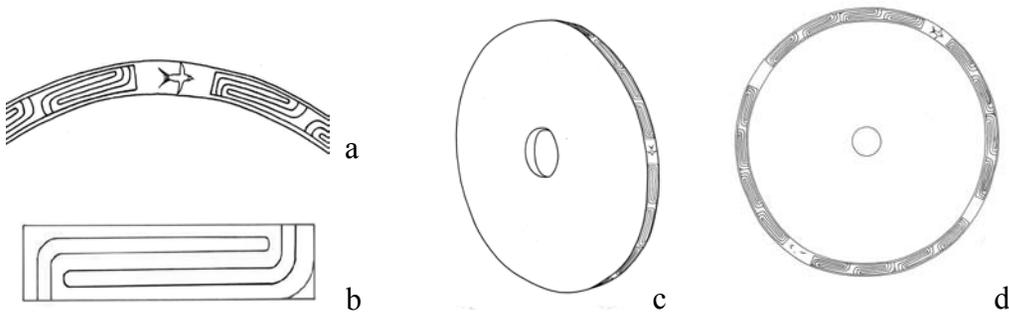


圖49 維多利亞博物館藏良渚玉璧及其符號 a：飛鳥與「交互雙L形符號」 b：「交互雙L形符號」的結構分析 c：玉璧半側面 d：若將窄邊所刻各符號依相對位置圍繞於玉璧外圍，可看出符號的佈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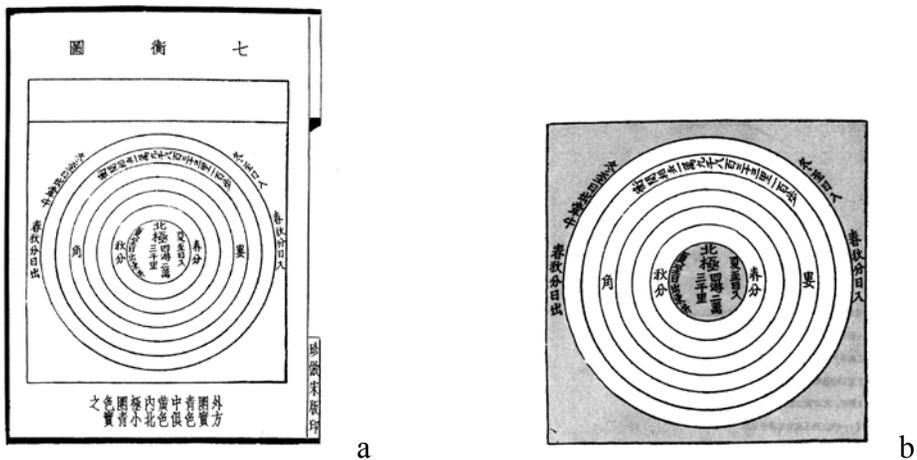


圖50 a：《周髀算經·七衡圖》 b：依《七衡圖》所記，實以青、黃二色的圖象（因係黑白版面，故以灰、白代替青、黃二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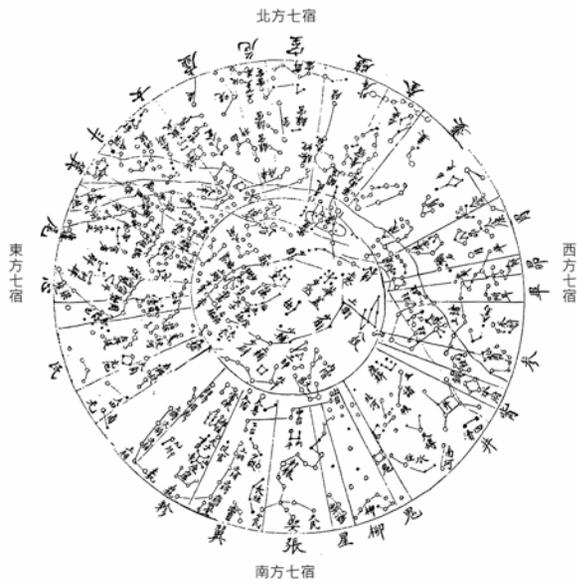


圖51 北天極及二十八星宿
引自游藝，《天經或問前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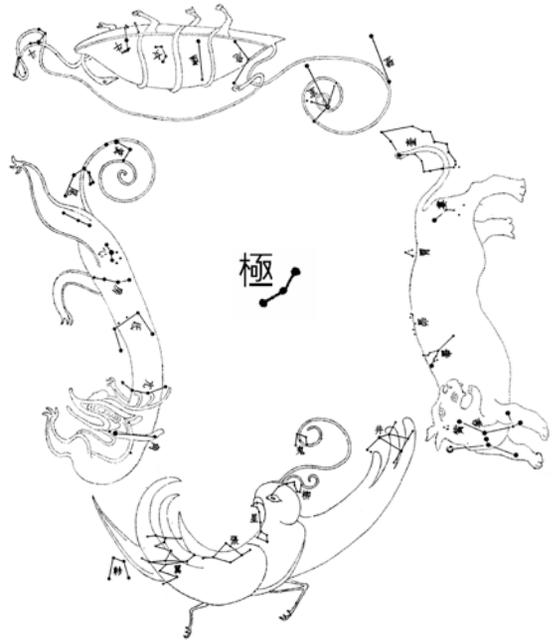


圖52 將二十八星宿想像為四種動物
四種動物圖象引自：陳久金，《中國星座神話》，
臺灣古籍出版社，2005。



a



b

圖53 南宋中期 玉璧 線繪圖 (a: 面琢龍紋、虎紋、雲紋 b: 面琢虎紋)
外徑8.1 孔徑3.1 厚1公分 鄭繼道墓(西元1201年)出土

